

# 红旗

HONGQI

10

一九六四年



#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十期 目录 ★

## 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蜕化 ..... 施东向 (1)

是“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还是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自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代替了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高踞于“工人委员会”之上的经理层——南斯拉夫的工人重新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社会所有制”其名，国家资本主义其实——铁托集团向帝国主义卖身投靠意味着什么？——苏共领导为铁托集团辩护的目的何在？

## 论人的因素第一 ..... 本刊评论员 (20)

## 我军指战员怎样学习毛泽东著作 ..... 肖华 (27)

## 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应用 ..... 王承放 (35)

## 挤和钻 ..... 苏思本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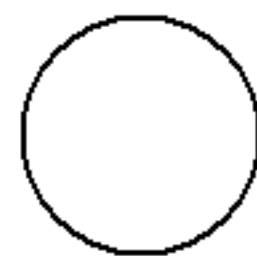
## 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比学赶帮”运动

——华东地区在工业战线上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几点体会 ..... 韩哲一 (39)

## 学术讨论 { 关于实践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 ..... (47)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客观标准 ..... 杜雷 吴俊光 (50)

再谈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标准问题 ..... 何祚麻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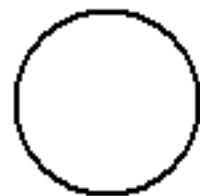


☆ 五月二十三日出版 ☆



# 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蜕化

施 东 向



铁托集团控制的南斯拉夫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国家？这个问题，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争论的一个尖锐问题。

前一个时期，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为了辩护他们所谓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论断，曾经煞有介事地说，南斯拉夫没有私人企业，没有私人资本家。近来，有人有的时候虽然还在重复这种滥调，但是，他们唱得远不像过去那么起劲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简直像魔法师一样，一种咒语不灵了，又再三念叨起另一种咒语来。说什么南斯拉夫的工业和商业都是社会主义成分，说什么“南斯拉夫经济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在发展的”。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反华报告的时候，还装腔作势地说：“如果不是从主观主义观点出发，而是从客观规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出发，就不可能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

南斯拉夫的经济，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南斯拉夫的工业、商业，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明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却偏偏一口咬定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他们的居心何在？

这些问题，《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已经作了回答。我们这篇文章，准备用更大量的材料，进一步作些具体的说明。

## 一 是“社会主义阵地正在加强”，还是资本主义已经复辟？

人们知道，在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南斯拉夫确实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

但是，在铁托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事情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铁托集团对外投靠美帝国主义，对内为资产阶级服务，使南斯拉夫人民通过革命战争建立的政权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他们利用这个政权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在



企业里推行“工人自治”，从生产、流通、分配各个方面，彻底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

铁托集团所实行的“工人自治”究竟是一种什么货色？他们怎样通过“工人自治”，一步一步地使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呢？

一九五〇年六月，南斯拉夫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家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工人自治”，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并且规定企业有权决定经营的方针，有权自行分配企业的一部分积累，有权自行招收和解雇职工。

企业实行“工人自治”，直接冲击着统一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一九五一年底，铁托政权正式颁布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法令》，宣布废除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

由于企业的收入是靠在市场竞争中获利多少来决定，职工工资也就不能不随着企业收入的多少而改变。一九五一年底，铁托政权废除了原来由国家统一制定工资标准的制度。从一九五二年起，实行所谓新的工资制度。这个制度规定：由企业（实际上由经理）自行制定工资标准；把工人工资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利多少联系起来，实行所谓“分红”制度；企业亏损，就要减发工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铁托集团颁布《关于创办企业和店铺的条例》、《关于停办企业和店铺的条例》。宣布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所谓“合伙的公民”，经过国家批准，都有权创办企业，企业可以自行联合或分离。当企业无力上缴利润和偿还债务的时候，除了那些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加以“扶植”的以外，就要被“强制清点”，勒令关闭，拍卖财产。

同时，还颁布了《经济组织固定资产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企业在保持固定资产原有价值和保证缴纳固定资产利息的条件下，有权以买卖或租赁的方式使固定资产“自由流通”。并且规定，经过联邦国民经济国务秘书长的批准，可以把固定资产出卖给私人。

对外贸易制度的改变，是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铁托集团就取消了对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一九五三年又颁布《外贸经营法令》，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允许企业直接和外国垄断资本企业进行贸易。这样，就为南斯拉夫企业直接依附国际垄断资本，为帝国主义的资本和商品侵入南斯拉夫，大开方便之门。

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的过程，是由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铁托集团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所以，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铁托集团实行“工人自治”，特别鼓励企业“自由化”，鼓励市场竞争，放手让企业追逐利润。

这种企业的资本主义“自由化”，给南斯拉夫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面对着这种情况，铁托集团所关心的不是阻止资本主义的“自由化”，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只是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强他们对“工人自治”企业的控制。



从一九五四年开始，他们在各行各业建立经济协会，加强铁托政权对各地方、各部门和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对物价和工资实行管制，用降低工人收入的办法增加企业利润。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把各企业的利润中的绝大部分以税收、利息的形式，归于铁托集团所控制的国家手中。

在铁托集团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和措施之后，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实行卖身投靠的政策之后，他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一系列对内对外的现代修正主义政策，加以系统化、条理化。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召开的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臭名远扬的南共联盟纲领。

铁托集团在制定这个纲领的时候，虽然也塞进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句，并且堆砌了许多模棱两可、难以捉摸的用语，但是，只要剥开这层画皮，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纲领规定：

第一，“工人自治”是为南斯拉夫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力量的独立的和更自由的运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是不同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社会所有制”的企业。

第二，“工人自治”的企业“在自己的计划内”，对生产和流通、基金、投资、生产能力的利用及其定期更新和替换、工人个人收入、同其他企业联合以及自己的业务范围中其他比较重大的问题，“独立地作出基本的决定”。

第三，“工人自治”企业这种“劳动集体”，在劳动和经营中，“享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

第四，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不能使人的个人幸福服从任何‘更高的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的个人幸福”，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刺激，“是他们活动的一种根本的动力”。

第五，“自发势力被理解为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一种自由活动”，应该鼓励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应该“保证人在创造和使用财富方面有最大可能的自由”，而不应该妨碍“个人和企业的主动性”。

第六，南斯拉夫的“计划经济（而同它一起的还有社会主义）不应该意味着把整个社会变成一架机器”。这也就是不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sup>①</sup>。

此外，这个纲领还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和管理是“官僚主义”，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巨大危险”，发展到极点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这个纲领，应有尽有地包罗了铁托集团从一九五〇年实行“工人自治”以来的使资本主义复辟的政策。铁托集团宣称，纲领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规律”。

<sup>①</sup>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8页。



这个綱領的所有規定，都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完全對抗的，都是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原則完全對抗的。这个綱領中所吹噓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規律”，同一九五七年宣言所總結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九条普遍規律，也是完全對抗的。

这个綱領的通过和发布，表明铁托集团現代修正主义路綫的定型；表明他們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底背叛；表明铁托集团已經死心塌地地要破坏社会主义經濟，使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表明他們不但不願意回到社会主义陣营里来，而且决心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別动队，妄图使他們的路綫在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瓦解整个社会主义陣营。

恩格斯說过，“一个新的綱領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sup>①</sup>从上面的事实，人們看得很清楚，铁托集团的綱領，正是这样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这个旗帜，就是复辟資本主义的旗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旗帜，反对社会主义陣营的旗帜，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反对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旗帜，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总之，这是一面彻头彻尾的現代修正主义的旗帜。

在铁托集团树起了这面現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以后，他們对内更加紧推行資本主义复辟的政策，对外也更进一步实行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在南斯拉夫的工业和商业方面，铁托集团在一九六一年又实行了一次“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內容是：

在企业内部，把車間、甚至生产者小組作为独立核算的“經濟单位”，各个“經濟单位”，“完全按照市場上形成的关系”，“按照市場价格”进行交易<sup>②</sup>。同时，增加捐稅，进一步实行地方財政自理，让各个地方政府“怎样賺錢就怎样过活”<sup>③</sup>。

在对外貿易方面，統一外汇率，进一步放寬进出口的限制，允許許多重要的再加工材料和若干消費品“自由进口”，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放寬其他商品的进口限制。

經過这次“改革”，南斯拉夫的經濟在資本主义道路上愈走愈远，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依附愈陷愈深了。南斯拉夫經濟更进一步地被納入世界資本主义体系，成为它的一个从屬部分。

一九六三年，铁托集团頒布了新宪法。卡德尔在新宪法的报告中說，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綱領的概念“在政治法律和組織方面的具体化”。实际上这就是用国家宪法的形式，来保护資本主义复辟。用国家宪法的形式，来推行現代修正主义綱領，宣布一切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綱領、反对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力量和他們的行动，都处于非法的地位，以便于铁托集团利用他們手中的国家机器，进行鎮压。

以上这些，就是一九五〇年以来，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南共联盟綱領公布以来，資本主义

① 《給奧·倍倍尔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頁。

② 伏克曼諾維奇：《新关系的核心寓于經濟单位》。1961年4月30日、5月1日和5月2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③ 托多羅維奇：1960年12月13日在南斯拉夫联邦工业协会管理委员会會議上的講話。



在南斯拉夫复辟的“事实”和“现实过程”。

正是从上面这些“事实”和“现实过程”出发，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南共联盟纲领公布以后的“事实”和“现实过程”出发，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这种判断同一九六〇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对铁托集团所控制的党和国家的性质所作出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

苏共领导也明明知道这些“事实”和“现实过程”，但是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报告中，却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什么一九五七年以后，“这样的事实，这样的过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在这里，我们借用一句他们自己说过的话问问他们：“难道这种主观主义和专横行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 二 自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代替了 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

南斯拉夫的企业，实行“工人自治”以后，它们的经济活动的方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南共联盟纲领的推行以及一九六一年的改革，更加深了这个变化。

第一、企业的生产，不再是以满足全社会每个成员的需要为目的，而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

第二、企业产品的品种、产量，不再根据国家统一的生产计划安排，而是由企业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决定。

第三、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再根据国家统一的物资分配计划调拨，而是通过市场自由买卖。

第四、企业产品的价格基本上不再由国家统一规定，而是在市场上自由形成。

第五、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不再由国家统一安排，而是在市场上自由雇佣，并且可以自由解雇。

第六、企业所需要的信贷资金，也不再按照统一计划投放，而是由银行采取投标的办法，谁出的利息高、偿付快，谁就得到贷款。

把这些变化集中起来，就是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代替了国家统一计划的调节。

对于这一点，铁托集团自己是从不隐瞒的。卡德尔就曾明明白白地说过：在南斯拉夫，“企业在自己的活动中是自由的，任何管理机关都不给它规定政策，它在市场上自由竞赛。”<sup>①</sup>南斯拉夫的法令也清清楚楚地规定：企业“应当在营业中保持健康竞争的原则”，各个企业之

<sup>①</sup> 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1955年1月1—3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間必須保守“业务秘密”，任何机关都“不得限制竞争自由”<sup>①</sup>。

铁托集团极力隐讳的是这种变化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诡辩说：这种变化，是他们“及时地认识进一步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并为消除阻碍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积极行动。”并且说，这种“改变”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sup>②</sup>。

为了揭破他们的这种欺骗，我们最好还是先看看他们实行这些“改变”以后，在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种种事实。

在南斯拉夫，各个企业，为了追逐利润，相互之间展开了十分激烈的竞争。

当市场上某种产品销路好、利润高的时候，原有企业就拼命扩大生产，新的企业也纷纷出现。在一九五九年感到需要农业机器，那时就一下子出现了过多的制造农业机器的新企业<sup>③</sup>。一九六〇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初，“砖瓦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好像金矿一样，有些地方价格上涨了两倍！”于是许多制砖企业就纷纷扩建，兴建新厂，造成“大量积压，没有主顾，流动资金冻结”，“整个行业因此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sup>④</sup>。一九六二年有四百多家铸造厂，“造成了市场上的‘拥挤’，首先是不忠实的竞争，不履行合约，从而给生产带来了混乱”<sup>⑤</sup>。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南斯拉夫《战斗报》报道，“今年春天，南斯拉夫铁路在两年没订货之后，订购了三千个车皮，铁路车辆的生产者像饿狼一样地抢生意。”

有竞争，就有兼并，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南斯拉夫报刊报道，南斯拉夫的五家自行车工厂，在争夺市场的斗争中有两家已经垮台了。剩下来的三家，一九六三年争夺市场销路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sup>⑥</sup>。仅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的不完全材料，近几年来，经过法院正式判决倒闭的企业，每年都有五、六百家。

竞争必然形成垄断，而垄断也挡不住竞争的洪流。像现代交通运输这样集中统一的行业，也出现了各霸一方的奇特现象。铁路曾被划分为二十九个独立的企业进行管理<sup>⑦</sup>，它们为了保持对于各自管辖地区的垄断，在竞争中，一个企业经常使另一个企业的车皮空着回去。

为了垄断市场，南斯拉夫各个“工人自治”企业之间，争夺技术力量，保守技术秘密，更是屡见不鲜的事。它们还在报上、广播中互相攻击。生产缝纫机的巴加特工厂，利用广告攻击别的企业所经营的进口缝纫机是“三等货”，吹嘘自己的产品“质量是缝纫机生产技术成就的最高峰”。受到攻击的企业跟着在报上登广告反击<sup>⑧</sup>。

① 1962年《调整市场营业关系法》。《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1962年第30期。

②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

③ 参见1961年6月21日南斯拉夫《经济评论》。

④ 1962年2月28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⑤ 1962年9月25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⑥ 1963年1月18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⑦ 参见1962年5月19日南斯拉夫《经济政策》周刊。

⑧ 1960年8月31日南斯拉夫《新闻晚报》、1960年11月23日南斯拉夫《解放报》。





南斯拉夫的物价是随着竞争和市场供求变化而波动的，非常混乱。不仅在各个城市和各个地方，而且在同一地方的各个商店里，甚至是从同一生产者那里买来的同类货物，价格都有很大差别。企业为了追求暴利，完全不顾生产和社会消费的需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

南斯拉夫报纸报道，在一九六〇年上半年，投机活动的狂热“席卷了建筑材料市场”，许多企业采购、囤积建筑材料，造成市场上建筑材料奇缺的现象。结果使木材的价格猛涨一倍到一倍半，钢筋的价格涨了三分之二<sup>①</sup>。罗维尼亚“米尔纳”渔业企业，为了保持高价，有一次竟把一万二千公斤鲜鱼倒进大海<sup>②</sup>。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南斯拉夫的经济情况日益恶化，物价更加大幅度地上涨。

据南斯拉夫《指数》杂志一九六四年第一期报道，一九六三年和一九五九年相比，商品零售价格平均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八，其中农产品涨价百分之六十二，生活费用上涨百分之三十九。另根据官方材料，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二年同期相比，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六，其中农产品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十六。

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说：在近几个月中，涨价物品的单子太长了，除食品外，还有衣服、各种纺织品、家具、建筑材料以及供制造各种物品用的其他许多材料。这种涨价，从原料到产品，从工厂到商店，“连锁式地发展着”。

关于南斯拉夫市场的混乱情况，《经济评论》曾经写道：“行情、疯狂、冒险、投机等等，这些就是说明一切商业部门特点的概念。”<sup>③</sup>

铁托集团主管经济的托多罗维奇也说：“黄金的狂热席卷了一切——个人、集体、企业、预算机关、城乡小私有生产者以及暗藏的投机分子等等。”<sup>④</sup>

不仅在国内市场上，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南斯拉夫的企业之间，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外贸企业，“由于自私的原因”，“不择手段”和“不惜一切代价地赚钱”。它们彼此抢生意，抢顾客，互相排挤，争夺交易对手，它们的行为好像是“来自两个国家的”。常常是“二、三十家南斯拉夫外贸企业的代表来到同一个外国市场上”。“在同一个外国对手那里，出现了六家南斯拉夫企业，都向他推销同一个南斯拉夫企业的同一种商品”<sup>⑤</sup>。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南斯拉夫《战斗报》在一篇题为《五百吨蘑菇，二十家出口商》的报道中说：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的蘑菇出口商，都想“获得一些外汇，不惜在蘑菇价格上有大量损失，这些损失可以通过高价向国内消费者出售其他产品来弥补。”“他们以投机的狂热动摇了同外国商人的传统联系，并在收购和出口方面造成了真正的混乱。”

① 1960年6月5日南斯拉夫《新闻晚报》。

② 1963年11月25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③ 1956年8—9期南斯拉夫《经济评论》。

④ 托多罗维奇：《两条路线的斗争》，1954年。

⑤ 1962年1月17日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报》、1962年1月19日南斯拉夫《世界报》。



上述种种事实，究竟有哪一点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现象？有哪一点又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现象？

恩格斯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又说：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后，“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sup>①</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几年间，南斯拉夫的经济曾经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开始代替了“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

一九五〇年以后，铁托集团违背南斯拉夫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同前一个时期的变化完全相反，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又重新代替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这显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消除了“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而恰恰是消除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开辟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列宁说得很好：“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sup>②</sup>又说：“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sup>③</sup>

南斯拉夫的经济，不正是这样实现了“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吗？

### 三 高踞于“工人委员会”之上的经理层

铁托集团宣称，企业实行“工人自治”以后，企业是由工人委员会和工人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工人在企业中是“真正的主人”，还说什么企业经理必须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决议。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在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里，“真正的主人”是代表铁托集团的经理。工人委员会、工人管理委员会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兰科维奇承认：“一些人在经理和管理委员会的周围结成集团，形成了所谓‘上层’，他们力求掌握企业中的一切权力”<sup>④</sup>。南共联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德鲁洛维奇说：“管理事务不是由自治机构，而是由一些领导人来进行，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只不过是让这些领导人在形式上批准各项决定而已。”<sup>⑤</sup>铁托也说：“经理与地方政权的某些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并在自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5、241页。

②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全集》第27卷，第314页。

③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2页。

④ 兰科维奇1956年3月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六中全会上的报告。

⑤ 1961年5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己的企业中决定一切”<sup>①</sup>。

当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殷勤地表示要学习南斯拉夫“工人委员会”的经验的时候，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曾经发表评论说：“不要以为南斯拉夫的工厂真是由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的，它是由国家任命的经理来管理的，虽然也接受委员会提出的意见，而且有这种组织参加作出某些决定。”“总的说来，人们也许可以怀疑，工人委员会的影响是否比西德董事会中的雇员代表，或美国雇主必须与之谈判的工会交涉人的影响来得大。”

南斯拉夫企业经理们的权利，是铁托集团给予他们的。根据有关“工人自治”的法令的规定：第一，经理有权制止“工人委员会”任何决议的执行。

第二，如果“工人委员会”申请撤换经理，当地政府不同意的时候，必须改选“工人委员会”。

第三，经理可以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企业经理一样，任意处置以至开除职工，甚至可以开除不愿意和经理一个鼻孔出气的南共联盟在企业中的书记和“工人委员会”的委员。

这些，就使南斯拉夫的经理们在企业里处于至高无上的专制地位。

兰科维奇说，“由于批评企业和个别领导人的工作的错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或其他工人受到惩罚、被开除出企业，或者不断地被排挤到工资较低和艰苦的劳动岗位上去”<sup>②</sup>。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南斯拉夫《劳动报》刊载的伏克曼诺维奇的谈话中说：一九六三年中向他提出申诉的人一多半都是控诉劳动组织的领导人员非法解雇和虐待行为，“这种行为在某些地方具有广泛的规模”。他还说：“企业中的领导人或者互相勾结，或者在地方机关里有‘强有力的靠山’，所以，他们的错误通常都受到掩护，而专横行为却仍然受不到惩罚。”

南斯拉夫报刊上关于这方面的材料，更是举不胜举的。

《战斗报》说：有的企业经理“愿意接收谁就接收谁，并解雇那些批评他们的人。人员流动很大。虽然确定了工资基数，但是，到月底，经理却在一小块纸上确定谁得到多少”<sup>③</sup>。

《劳动报》报道：“某些领导人讹诈自己的集体和管理机构，迫使它们解雇那些正当地批评企业中专权、官僚主义、裙带关系、滥用职权、滥用领导地位、不正当的特权和其他消极现象的工人。有些领导人坚持搞掉‘不如意的’工人”<sup>④</sup>。

《新闻周报》说：贝尔格莱德“斯拉维亚”饭店经理，“通过巧妙地挑选管理机构人员，使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完全受自己的束缚”，“凡不同意他的行为的人都得离开企业，不管这个人多么正确，也不管这个人用什么论据来维护自己的观点。如果这个人自己不想走，那么有各种排挤的办法，在三年当中就有三百四十二个人离开了企业（该企业约有五百人）。差不多整个集体在这一期间被改换了。”<sup>⑤</sup>

① 铁托 1962 年 5 月 6 日在斯普利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② 兰科维奇 1966 年 3 月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六中全会上的报告。

③ 1963 年 11 月 2 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④ 1962 年 1 月 6 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⑤ 1963 年 11 月 24 日南斯拉夫《新闻周报》。



据一九六三年第五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透露，在南斯拉夫，被解雇的人员年年增加。在一九六〇年是二十九万四千人。一九六一年是三十四万七千人。一九六二年达到三十七万九千人，相当于经济部门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左右。

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企业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集团。这个集团，掌握“企业中的一切权利”，“在地方机关里有强有力的靠山”，他们可以采取各种专横手段，“虐待”职工。

南斯拉夫的企业，在实行“工人自治”以后，剥削和被剥削的资本主义关系，又在经理层和工人群众之间重新产生了。

在企业里，按照铁托集团的规定，经理和高级职员“正常收入”已经很高。加上他们利用特权，在特别津贴、特别奖金、差旅费以及“礼金”等等名义下，取得大量收入，使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有很大一部分落到了经理层的手里。

一九五八年，南共联盟中央给各级组织和领导的一封信中承认，企业中极少数人的“个人物质特权有很大增长”。企业的“高额奖金”发给了“非常狭窄的领导人小圈子”。“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

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铁托承认，有的企业“在已实现的赢余中，工人只获得二千第纳尔，而另外却有人获得八万第纳尔。”这里所说的“另外的人”，当然就是享有种种特权的经理层。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四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报道，一个企业经理御用的“工人委员会”决定，在他行将离职的时候，一次就给他数达一百万第纳尔的奖励，大体上相当于五、六十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

《战斗报》曾经报道，一个工人写信给经理说：“你们分掉的钱是我们的工资”<sup>①</sup>。《政治报》也报道：“在某些工人和职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鸿沟，前者把后者看作是‘吞掉’他们工资的‘官僚’”<sup>②</sup>。

贪污盗窃、接受贿赂，更是企业经理们的一项大财源。铁托自己就承认，“在避开本国的企业而到国外去（购买货物）的这种作法后面，经常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贪污受贿行为”。各种“自私自利分子，即某些来自旧贸易机构的分子，或者那些利用诡计、贿赂或买贵卖贱来同外国人分肥而个人取得令人不能容许的个人利益的分子，都钻进了我们的对外贸易部门。这些诡计都是在各种所谓送礼的幌子下进行的。”<sup>③</sup>

南斯拉夫的报刊透露：“经理在生活水平方面，是属于生活得最好的几千个南斯拉夫人之列”。吮吸工人血汗的这一小撮人，平时，他们“在酒吧间和咖啡馆内放荡”，“购买手饰，供

① 1961年3月17日南斯拉夫《战斗报》。

② 1961年9月25日南斯拉夫《政治报》。

③ 铁托1955年11月27日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四中全会上的报告。



养情妇和情夫”，“也用贪污的钱买住宅、小汽车、昂贵的家具，有时还买土地”<sup>①</sup>。

南斯拉夫的经理层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决不是像铁托集团所说的那样是偶然发生的“消极现象”，它是南斯拉夫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现代化的大企业，不能没有权威，不能没有经理和工人之间的分工。

如果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么，经理就是生产上的指挥员，他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受剥削的劳动者间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

如果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理就不单是生产的组织者，而且是剥削者。马克思说过：“如果资本主义的指挥在内容上是二重的——因为他所指挥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二重的过程，一方面它是形成一个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它在形式上却是专制的。”<sup>②</sup>

南斯拉夫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经理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曾经一度是不受剥削的劳动者间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但是，在实行“工人自治”以后，企业就变成了追逐利润、进行竞争和投机的独立的单位，而在这个单位里，经理是独断专行的。于是，这些人就只顾他们的私人特殊利益，变成了剥削者和压迫者。

他们和私人资本家不同的地方仅仅是：他们是铁托政权的代表，享有资本家的各种权利，又不承担资本家破产的风险。因此，这些人更具有冒险性，在竞争中更是为非作歹地扼死对方，贪得无厌地用各种方式强占工人的劳动果实。

#### 四 南斯拉夫的工人重新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

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状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根据官方的统计，除了大量流亡国外的劳动者以外，历年的失业人口数字是：

一九五三年	八一，六〇〇人
一九五四年	七六，二〇〇人
一九五五年	六七，二〇〇人
一九五六年	九九，三〇〇人
一九五七年	一一五，九〇〇人
一九五八年	一三二，〇〇〇人
一九五九年	一六一，六〇〇人

<sup>①</sup> 1960年10月15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sup>②</sup>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1页。



一九六〇年	一五九, 二〇〇人
一九六一年	一九一, 三〇〇人
一九六二年	二三六, 四〇〇人
一九六三年二月	三三九, 〇〇〇人 <sup>①</sup>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南斯拉夫的失业人口又在增加。据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南斯拉夫《战斗报》报道，一九六四年一月份，仅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就有十三万名失业者，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都是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

另据一九六三年一月联合国《统计月报》材料，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失业人口占全部工人的比重，大大高于英国、西德、日本，而一九六一年以后甚至已经大大高于美国。

南斯拉夫的失业工人逐年增加，而且增加得这样快，失业工人占全部工人中的比重这样高，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队伍，从下列两个方面得到经常的补充。

一方面，南斯拉夫农村中资本主义的泛滥，两极分化的加剧，使许多贫苦农民丧失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被迫流入城市，寻找职业。

另一方面，城市中各个企业之间疯狂地进行竞争，一批一批失败的企业被无情地清除，它们的职工不断地被抛入失业工人的行列。

这个经常得到补充而且越来越扩大的失业队伍的存在，使南斯拉夫企业的经理们，有可能按照他们苛刻的条件，挑剔地选雇那些苦于找不到职业的工人，同时又有可能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随时地开除那些“不合意”的在业工人。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被解雇工人的数量超过同期失业工人的数量，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南斯拉夫失业工人队伍的存在，对于南斯拉夫的在业工人，正是一种难于抗拒的强大压力。

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膨胀了工人阶级中后备军的队伍；反过来，这个后备军由竞争对就业部分发出的加大的压力，又强迫后者不得不过度劳动，不得不服从于资本的命令。工人阶级一部分因为其中别一部分过度劳动而被迫得无事可做的情形，以及反过来情形，成了资本家个人发财致富的手段，同时又适应于社会积累的进展，按相应的规模，加速产业后备军的生产。”<sup>②</sup>

南斯拉夫的情况正是这样。

由于失业工人队伍的存在，经理们有可能在物价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压低在业工人的工资，使广大工人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

根据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南斯拉夫《经济评论》的统计材料，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到十一月期间，南斯拉夫整个工矿业中，就业工人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在一万五千第纳尔以下的，占

① 见1963年第3期、第5期南斯拉夫《指数》杂志。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99—700页。



在业工人百分之二十点九，每月平均收入一万五千到二万第纳尔的工人，占在业工人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一，两者合计，占在业工人的百分之四十六。按照铁托集团的官方意见，在南斯拉夫，每人每月平均二万第纳尔的工资是很难过得去的。

而且，就是这样低的工资，也常常不能够如数拿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三日南斯拉夫《政治报》透露，塞尔维亚扎耶加尔县罐头厂女工米连科维奇说：“我的工资是一万七千第纳尔，但是已经有四个月我每月得到六千第纳尔，上个月只得到了四千第纳尔。越来越少……这将达到何时为止呢？”

南斯拉夫工人的收入这样少，他们的支出情况又是怎样呢？

南斯拉夫报刊透露：租私人房屋住的单身工人，仅房租一项的支出，就占他们工资的三分之一<sup>①</sup>。有的占收入的一半<sup>②</sup>。一个每月工资一万二千六百第纳尔的工人，他的支出情况是：伙食费五千五百第纳尔，房租（住在私人房屋的过道里）四千第纳尔，偿还分期付款二千第纳尔，只剩下一千一百第纳尔作为其他开支<sup>③</sup>。

《政治报》所报道的塞尔维亚扎耶加尔县罐头厂，女工腊马丹诺维奇对记者说：“从七月以来我们每月收到六千第纳尔，而最近这个月总计只得到三千第纳尔。只够买面包的！要是我一个人的话，……可是还有孩子们，孩子们。”

女工约万娜哭着说：“我心上有什么呢？压着一块石头！冬季食品我还没买，燃料也没买，也没有给孩子们买些暖和的衣服穿。我得了三千第纳尔，先用到什么地方呢？我还给一个妇女一千第纳尔的债，用一千第纳尔买了最必需的食品，另外的一千第纳尔留下买面包。……我们的收入为什么这么少呢？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干得非常多……”。

最近，南斯拉夫工人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陆续下降，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南斯拉夫《劳动报》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以《普遍抗议涨价》为题刊登了一篇对贝尔格莱德三家企业的一百五十名职工生活情况进行调查的材料，调查结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生活得更坏了”。这家报纸说：“绝大多数职工对物价不稳定，特别是对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感到愤怒”。

由于失业工人队伍的存在，使经理们有可能任意增加在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强他们的劳动强度。

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南斯拉夫《政治报》报道，“在一家著名的纺织厂中，工人实际上不能工作十年以上”。“在贝尔格莱德一家著名的企业中有一百个劳动能力减弱的工人。调查表明，在一百人中有八十人来自农村。他们很多没有自己的住房，每月不得不付出五、六千第纳尔去租房住。”“所有这些人都不不得不在早上三点钟起床，以便及时上班。在企业中停留到十

① 1959年7月4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② 1962年7月15日南斯拉夫《新闻周报》。

③ 1959年1月14日南斯拉夫《青年报》。



四点钟，接着又去赶火车，直到傍晚大约十八点钟才回家。显然，他们没有休息时间。此外还应补充说，调查表明，这一百名工人中七十五名每天只吃一顿饭。”“据某些材料，在这些组织中大多数三十岁至五十岁的人已经完全丧失能力，不能从事生产了。”

由于失业工人队伍的存在，得到铁托集团支持的经理们，根本不关心改善在业工人在劳动中的保险和安全，使工伤事故多得惊人。

据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南斯拉夫《新闻周报》报道：“工业中工伤的百分比，南斯拉夫是世界第一”。

这就是南斯拉夫工人（包括在业工人、失业工人在内）现在的劳动条件。这些和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的劳动条件，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列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担负某一部分社会所必需的工作，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工作量。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储藏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sup>①</sup>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是“对于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剥削制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大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挥霍现象的消灭；失业现象的消灭；劳动是每个有工作能力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劳动权，即每个公民领得有保障工作之权；休息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等等。”<sup>②</sup>又说：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简单地宣布劳动权，而是要用消灭失业的办法，来保证劳动权。

南斯拉夫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里工业和商业等部门的生产资料，除了一部分掌握在私人资本家的手里以外，都掌握在铁托集团及其在企业中的代理人的手中，工人阶级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一九六三年通过的南斯拉夫的宪法中写道：“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于南斯拉夫工人阶级来说，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铁托集团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作为剥削工人的工具。他们不是采取措施来消灭大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的现象，反而通过所谓“分红”、“奖金”等个人物质刺激的办法，来培养一个掌握种种特权、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剥削集团。他们不是采取措施来逐步消灭失业，保障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反而是通过那种助长农村两极分化的政策，鼓励企业疯狂竞争的政策，使工人失业的现象愈来愈严重，像一般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为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保留一个可以自由处置的产业后备军。

南斯拉夫工人由于已经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由于劳动权利没有可靠保障，他们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1页。

② 《论苏联宪法草案》。《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808—809、812页。





已經根本不能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按等量劳动領取等量产品”。他們实际上已經变成了劳动力的出卖者，只能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一样，按照劳动力的价格，取得工資。而这种价格是經常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的，对許多工人來說，已經无法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

铁托集团的“理論家”說，他們那里的“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人与人之間的政治关系和經濟关系。”<sup>①</sup> 这句话本身是没有什么可爭論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那里，人与人之間的政治关系和經濟关系是什么样性质的关系？

从上面种种事实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和铁托集团及其在企业中的代理人之間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早已經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关系，而是雇佣和被雇佣、剝削和被剝削、統治和被統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关系。

### 五 “社会所有制”其名，国家資本主义其实

铁托集团宣称，他們的企业实行“工人自治”以后，国家所有制变成了“社会所有制”，变成了“直接的社会占有”，并且說，这种“社会占有”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sup>②</sup>。

他們还說，在这种“社会所有制”的企业里，“生产者成为管理生产的社会职能的承担者，同时，也成为社会产品分配职能中的积极参加者。作为政权的国家愈来愈少地在直接生产中出现。”<sup>③</sup>

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騙。

第一，从前面的材料和分析中，可以看出，管理生产的社会职能，社会产品的分配职能，都完全掌握在企业經理的手中。而这些經理，按照铁托集团的說法，在企业里“是作为‘国家的’因素出現的”<sup>④</sup>。

第二，企业經理在名义上是由企业的“工人委员会”招聘的，实际上，却必須由当地政府通过以后才能任命。企业經理的撤換，有的时候虽然可以由“工人委员会”提出申請，但是，撤換或者不撤換，却完全由当地政府决定。

第三，铁托集团，一方面，把这种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的經理主宰一切的企业，装扮成所謂“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的企业。說什么，这种企业的“社会财产”，“不是作为法律上的所有主的财产，而是作为直接加以集体享用的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财产。”<sup>⑤</sup> 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的法律却赤裸裸地規定，铁托集团的国家，有权用捐稅、利息等形式，取走工人所創造的

①⑤ 博格丹·奥索尔尼克：《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政策》，1963年11月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

② 《铁托演說和論文集》第5卷，薩格勒布进步出版社1959年版。

③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

④ 馬尔科維奇：《南斯拉夫經濟关系的发展》，貝尔格萊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絕大部分剩余价值。例如，根据对薩格勒布市百分之五十的工业企业的調查，在一九六三年上半年，铁托集团通过捐稅、利息等形式，拿走了企业百分之七十九点五的“淨产值”<sup>①</sup>。

第四，铁托集团，一方面，向这类企业的工人們約許，他們有权用“分紅”、“獎金”等形式，自行分配企业的一部分积累。說什么生产者和劳动集体在企业“某些基金分配中，应享有最大限度的独立性”<sup>②</sup>。另一方面，却用法律的形式硬性規定，如果某些企业不能按时按数向铁托集团的国家上交捐稅和利息，国家就要关闭这些企业。工人們不但得不到額外的“分紅”，而且得不到应有的工資，甚至会被无情地从企业中抛到失业工人的队伍里去。

第五，南斯拉夫的主要企业，都是各級政权出資建立的，亏损的企业，如果是同铁托集团的命运有密切关系的，都由国家实行財政補貼。補貼的形式很多，除了联邦政府的補貼，还有降低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利息，勾銷“收入上交”，以及从地方基金和預算中給予直接和間接的補貼，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說明了什么呢？它說明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絕不是像铁托集团說的那樣，是生产者“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的“社会所有制”，而是铁托集团的国家所有制，“生产資料的代表者仍然是国家”<sup>③</sup>。

那么，这种“国家所有制”是什么性质的呢？

根据前面的分析，不論从企业与企业之間的相互关系来看，还是从經理与工人的相互关系来看，都不能說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而是資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

这里需要特別說到的，在南斯拉夫，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蜕化为資本主义性质的国家所有制，是同南共联盟由无产階級的政党蜕化为资产階級的政党，南斯拉夫的国家政权由无产階級专政蜕化为资产階級专政，这个极端重要的事实密切联系着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南斯拉夫的国家資本主义，并不是无产階級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資本主义，而是资产階級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資本主义，是道道地地的資本主义經濟。

在苏共領導看来，铁托集团一方面鼓励企业之間的瘋狂竞争，另一方面，又強調国家对企业經濟活动的控制和干預，是互相排斥的。他們故意制造混乱，用铁托集团的国家对企业經濟活动的控制和干預，来证明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陣地正在加强”。

稍为有一点馬克思主义經濟学常識的人，都不难揭穿这种詭辯。因为就是在一般資本主义社会里，竞争和国家干預也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在苏共領導看来，铁托集团一个时候強調分散經營，另一个时候又強調統一管理，也是互相排斥的。他們故意制造混乱，用铁托集团的統一管理来证明他們“已經改正錯誤”，正在加强“計划性”。

① 1964年4月4日南斯拉夫《劳动报》。

②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

③ 烏約舍維奇：《南斯拉夫經濟制度的特征》。《南斯拉夫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貝爾格萊德1961年版。



只要真正从南斯拉夫的“事实”和“现实过程”出发，就不难看出，分散也好，统一也好，共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

总起来说，铁托集团鼓励疯狂竞争，实行国家干预，支持分散经营，加强统一管理，都是为了经过他们在企业里的代理人，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从企业拿走尽可能多的利润。

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南斯拉夫的各个企业之间，就是像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把自然界生存斗争的规律，“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铁托集团的国家是从不干预的。

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南斯拉夫的企业经理们，就是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一样，作为“吸血鬼”贪婪地吸吮着“活劳动的血液”，工人倍受欺凌，饱尝贫困，铁托集团的国家也是从不干预的。

恩格斯在说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资产阶级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①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说，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分析南斯拉夫的大量“事实”和“现实过程”，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 六 铁托集团向帝国主义卖身投靠意味着什么？

南斯拉夫的国家政权蜕化为资产阶级专政，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同铁托集团向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卖身投靠这个重要事实，交织在一起的。

自从一九四八年，特别是一九四九年铁托集团帮助希腊反动派扼杀希腊人民革命以后，美帝国主义看中了铁托集团，接着就用重金收买。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止，铁托集团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获得了共约五十四亿六千万美元的“援助”，其中，美国的“援助”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约为三十五亿美元。

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0页。



在美国的三十五亿美元的所谓“援助”里面，大约二十五亿美元是经济“援助”。如果除去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四亿多美元，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三年一月，美国对铁托集团的经济“援助”，共计二十亿多美元。其中，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九年共计十亿多美元，平均每年约一亿美元；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三年初，五年多共计十亿多美元，平均每年约两亿美元。

一九五八年南共联盟的现代修正主义纲领公布了，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发展速度特别加快了，美帝国主义给铁托集团的奖赏也就随着成倍地增加。这就可以看出，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美帝国主义经济“援助”的增长，是紧密配合的。

美“援”，决不像叛徒铁托所无耻辩解的那样，是什么“完全新型的特别有利的经济援助”。美国《哈泼斯杂志》主编约翰·费希尔，在写给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福勒·汉密尔的一封信里，曾经非常露骨地说过：“美国在援外上每做一件事（或每拒绝做一件事）都是为了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所以我相信，你会在每一角银币上都系上一根链条。如果这个银币不是为清楚地规定好的美国利益花用，你就会死劲勒紧这根链条。”

美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死劲地勒紧套在铁托集团脖子上的美元链条，迫使铁托集团同它们缔结了一连串的卖国条约，签订了一系列出卖主权的协定，向美帝国主义一批一批地出卖南斯拉夫的独立主权，从而使铁托集团所控制的南斯拉夫，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

铁托集团出卖了南斯拉夫的主权，美国取得了控制南斯拉夫军事、外交和内政等权利，包括促使南斯拉夫推行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权利以后，美帝国主义的商品和资本，就源源不断地涌进去了；执行美国侵略政策的军事人员、情报人员和其他各种人员，就像苍蝇一样地嗡上去了；美国腐朽的生活方式，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南斯拉夫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种外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势力，进入了南斯拉夫的国土，就必然加强南斯拉夫的资本主义势力，推动他们同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一度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势力，进行誓不两立的斗争。引狼入室的铁托集团，被“美援”链条勒得愈来愈紧，也就同美国垄断资本势力更加狼狈为奸，加紧向社会主义势力进攻，卖力地在南斯拉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所说，南斯拉夫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买办性的国家资本主义，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新产生的剥削阶级，不仅是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而且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这是完全正确的。

## 七 苏共领导为铁托集团辩护的目的何在？

近几年来，苏共领导已经成为铁托集团最卖力的辩护士。他们辩护得最起劲的，是关于南斯拉夫经济的性质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居心何在？目的何在？



《紐約时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的社論，透露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这篇社論說：“南斯拉夫采用的西方的主張是这样多，因而它可以起一种傳送帶的作用，把西方經濟主張傳給东方”。

苏共領導为铁托集团辯护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这个“傳送帶”，陰謀把苏联引上南斯拉夫的道路，使苏联人民面临着資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險。

苏共領導已經死心塌地同铁托集团合伙。但是，又想不让人家說他們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朋友。

苏共領導一心一意向叛徒铁托集团学习。但是，又不想让人家說他們是叛徒的学生。

这种想法和作法，使他們处在一种十分尷尬的地位。

苏共領導声称，他們和铁托集团都“屬於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論为指南”。人們不能不問，这个“思想”和“理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还是現代修正主义的？他們索性公开背棄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掩盖铁托集团叛变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实，說什么南共联盟是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

苏共領導強調，在他們和铁托集团之間，有必要“相互学习彼此的經驗”。人們也不能不問，这种“經驗”，是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还是資本主义复辟的經驗？他們就拚命掩盖資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的事实，說什么南斯拉夫是在“具体建設社会主义”，并且說铁托集团的“特殊道路”的“經驗”，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貢獻”。

他們滿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尷尬的处境。

但是，无数的經驗证明：一切搞陰謀詭計的人，愈是用他們自以为得計的方法来欺騙人，結果总是更加无情地暴露出他們的真面目。

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的命运，不能不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



# 论人的因素第一

本刊评论员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①</sup>

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便是人们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是人们创造和运用劳动工具进行生产的历史。人和其他动物的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自觉地创造和运用各种工具，改变自然物，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人们在生产中，向自然界作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地改善在各种条件下运用的工具，这就发展了生产技术。劳动工具，是人手的职能的延长，是人自身能力的扩大。人们历史地变化着劳动工具，也历史地变化着自身的能力，并促进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四个第一”的原则，首先提出的是，在处理人和武器的关系时，必须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这就是说，在人和物的关系中，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实际上，不但在处理军队中人和武器的关系时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而且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从事其他一切工作时，也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

列宁在一九二〇年讲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任务的时候，这样说过：“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坚定性。如果工人阶级决心作自我牺牲，如果工人阶级表明它善于用出自己的全部力量，那就可以解决任务。大家都来解决这个任务。工人阶级的决心，它实现自己‘宁死不屈’口号的坚决意志，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决定一切、战胜一切的因素。”<sup>②</sup>

关于战争的问题，列宁也同样地指出：“谁的后备多，谁的人力多，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sup>③</sup>“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認識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認識是取得胜利的保证。”<sup>④</sup>

① 《論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1页。

②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15页。

③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第56页。

④ 《在罗果日—西蒙区工人、红军扩大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17页。



一九一九年，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談到国内战争的經驗时，这样說：“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压迫者在斗争中运用了最优良的武器和战术，似乎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一旦把千百万劳动者和被剝削者真正喚醒，就会有极大的本領，就能創造奇迹。”<sup>①</sup>

由此可見，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的观点，正是列宁主义的观点。

懂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別对于一切正在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对于那些正在夺取革命胜利和正在建設自己国家的革命的人民，認識这个真理或者不認識这个真理，認識的深刻程度如何，是否能够在各种复杂的条件下都坚持这种認識，关系到他們斗争的前途，关系到他們革命和建設事业的成败。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統治阶级，总是拥有殘暴的镇压机器和精良的武器装备。面对着这样的敌人，革命的人民是恐惧退縮，还是敢于起来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当帝国主义和反动統治者进行暴力镇压和武装侵犯时，是逆来順受，妥协投降呢，还是敢于拿起武器来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敢于击败敌人的侵犯呢？

目前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民族革命胜利的国家，多数原来都是經濟、技术比較落后的。面对着这种情况，革命的人民是丧失信心、甚至卖身投靠呢，还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設自己的国家呢？

在这样的問題面前，革命的人民只有坚持“人的因素第一”这个原則，并且按照这种認識認真地去組織和部署自己的行动，才能开辟光明的前途。

在战争中，武器虽然給予战争的进程、战术的改变以重大的影响，但是，战争的最終結局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战争的实践不断地駁斥了各种片面地夸大武器的作用而貶低人的作用的論点，以为依靠某些新式武器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論点。

以前的不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战争，像一七七五——一七八三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一七九一——一七九四年的法国革命战争，都表明人的作用居于首要地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起义军队是用劣武器去抗击武器精良的英国殖民军的，起义军队在初期虽然訓練很差，装备不良，但是他們懂得为独立而战，为正义而战，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他們發揮了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战胜了英国军队。法国革命也是以装备不良的民兵式的军队，来对抗联盟国訓練和装备良好的雇佣军队。一七九二年，普魯士和奥地利在英国和沙皇俄国支持下武装干涉法国革命，当时的法国革命军队大部分是由志願军組成的，但是他們为卫国思想所鼓舞，受到人民群众中巨大的爱国热潮和革命热潮的支持，终于把干涉者的军队驅逐出国境。

<sup>①</sup> 《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組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1頁。



到了十九世紀，步槍技術不斷有所改進，出現了射擊效果相當好的新式步槍。當時有些人就認為這種武器是決定一切的，任何人的勇敢、人民群眾的力量，在這種武器面前，都將無濟於事。但後來的戰爭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根據當時一些戰爭的經驗，“軍界的輿論改變了；人們重新開始認識到贏得戰鬥勝利的是人而不是槍”<sup>①</sup>。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美國人馬罕曾經提出一種所謂“海上武力決勝論”，認為海上武力是決定國家歷史的主要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人杜黑又唱“空軍決定勝負論”；英國軍人福勒爾則提出只要有坦克和機械化武器就可以對戰爭構成百分之九十九的勝利，而其他戰爭因素充其量只能構成百分之一的勝利。所有這些論調，又都在戰爭的實踐中一一破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了核武器。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者，更大肆宣揚這種武器的威力，認為它對任何戰爭都起最後的決定作用。他們滿以為用這種大規模殺人的武器就可以嚇唬住革命的人民，使他們不敢進行反抗。但是，自出現原子武器以來的近二十年的歷史，又無情地宣告這種論調和企圖的破產。恰恰在這個時期，越來越多的被侵略、被壓迫的國家和人民，起來進行英勇的解放戰爭，用劣武器、短程武器戰勝了擁有現代化武器的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古巴人民以七支步槍發動起義，阿爾及利亞人民起義的時候也只有五百支陳舊的獵槍，當時面對着他們的，都是數以萬計的擁有現代化裝備的反動派軍隊或殖民軍。起義的軍隊最終戰勝了他們。美帝國主義者不能不承認：“占壓倒優勢的核實力制止不了游擊戰爭。”美帝國主義在南越戰爭中打算依靠直升飛機和水陸裝甲車這類武器消滅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裝，但是，他們的這種企圖也正在不斷地遭受失敗。

起義的人民為了戰勝敵人，當然需要不斷改善自己的武器裝備。但是，人民軍隊解決武器問題是依靠充分發揮人的作用，依靠正確的战略戰術，在很多時候是從敵人手里去奪取的。事實上，人民軍隊所擁有的武器，即使到了最後決戰關頭，在質量上也往往比不上反動軍隊。就是說，許多人民戰爭，如果單就武器一項來說，它們自始至終沒有占上風。它們取得勝利的秘訣在於人，在於贏得人心和人力。

有些人民的武裝鬥爭暫時失敗，原因也主要不在武器上，而是常常出於战略戰術方面的錯誤使人的作用未能充分發揮。所以他們只要能夠在這方面接受教訓，總有一天是會轉弱為強、轉敗為勝的。

一切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應當努力使自己的軍隊現代化，努力掌握和精通一切現代化的戰爭技術和業務。軍隊愈現代化，軍事技術愈進步，人的作用不是降低，而是顯得更加重要。人民軍隊的現代化，必須與軍隊的革命化相輔而行，並且以革命化為基礎。因為不管有

<sup>①</sup> 《步槍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2頁。





怎样的先进军事技术，在战争中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人的力量，要看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如何。现代战争特别表明这一点：没有军队的革命化，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即使有先进的军事技术，也不可能发挥它最高的威力。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力吹嘘某些新式武器的作用、贬低人的作用，是有它的阶级根源的。反动的剥削阶级脱离人民，和人民为敌，他们不得人心，当然不可能充分利用人力，因此，就只好迷信武器。但这样一来，优势武器在他们手里也就丧失了真正的优势，变成了吓人的纸老虎。他们即使在某种场合可能暂时取得一些胜利，但是最终必定归于失败。

以上是说的在战争中人和物的关系。这也就是说明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要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

历史上，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战胜旧的生产方式，都是由于在不同程度上解放了当时的生产力，主要又是由于解放了作为生产基本力量的劳动者，使他们有可能创造、或者有兴趣运用较进步的劳动手段，或者虽然使用一样的劳动手段，但是有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的效能，从而创造出高于过去的劳动生产率。

在剥削制度的社会，劳动者创造出生产技术、各种劳动手段，这些东西为剥削者占有，反过来奴役劳动者，成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技术、劳动手段奴役人的现象，宣告结束了。“人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翁，因为他们成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翁。”<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能动作用，人认识自然、驾驭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很大的、前所未有的发挥。在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下，在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人们能够创造出各种人间奇迹，也能够创造出一切最新的生产技术，运用它们来为社会生产财富。

社会主义生产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点之一，在于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们的精神状态极大地改变了，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力量。他们没有奴隶相，没有依赖心理，有信心凭借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自己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sup>②</sup>

俄国也曾经是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纷纷说：俄国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人们穷得不得了，没有起码的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纯粹是空想，是胡闹。列宁当时对于这一点答复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8页。

② 《介绍一个合作社》，《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第3页。



驅逐地主，驅逐俄国資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sup>①</sup>

推翻地主，推翻資本家，这就是首先驅除劳动者身上的压迫，使他們成为社会的主人，把蘊藏在他們身上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解放出来，为自己的命运而战斗。这就是說，首先解放劳动者的力量，爭得人心和人力，投入为社会主义的战斗，然后創造出必要的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消除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

大家知道，在列宁随后是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光荣的苏联人民正是这样做了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經驗同样地证明：在建設中，决定的因素也是人而不是物。只有具有无产階級革命精神、无产階級的觉悟性和坚定性、并且决心作出自我牺牲的人，才能建設社会主义，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去建設共产主义。丧失无产階級的革命精神，只知道追求个人物质刺激和高薪，滿脑袋装着資產階級的所謂“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并拿这些观念去腐蝕无产階級的意識，麻痺人民群众，这是不可能真正建設社会主义，更談不上建設共产主义的。

无产階級政党領導人民进行建設，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十分重視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作用，充分挖掘蘊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力量，把他們“要干、要革命”的这种精神和力量統統調动起来，組織起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正是从这样一个目的出发的。我們党关于建設工作的各項具体方針、政策和措施，也是根据党的总路綫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制定的。

当然，不能认为人們能够不顾客观物质条件而任意行动。人和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立的統一。人駕馭物，物則提供人的活动以某种条件。人們不能超越这些条件許可的範圍期求事情的成功，但在客观物质条件所提供的限度內，人的能动作用却有极广闊發揮的場所。在这个限度內，政治、思想、人的革命干劲，可以造技术，造其他物质条件。无数事实表明，具有大体相同的物质技术条件的部門，由于人們的觉悟不同，主观能动作用發揮不同，有的工作成績就好，有的工作成績就差。重視發揮人的作用，即使是比較落后的技术装备，也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而先进的技术装备就可以發揮出更大的效率。反之，如果不重視發揮人的作用，即使有先进的技术装备，也会把生产搞得冷冷清清，沒有生气，甚至会把生产搞坏。

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企业。社会主义企业除了要求在技术方面繼續逐步地实现現代化，还要求广大职工群众思想的革命化，使他們具备无产階級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只有广大职工群众思想的革命化，真正具有无产階級的意識，企业才有最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促进企业在技术方面的繼續現代化，并且使一切現代化技术發揮最高的效能，創造出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企业以奴役工人为前提。現代修正主义者对待社会主义企业，是用资本主义利潤原則来敗坏企业，

<sup>①</sup> 《論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35頁。



用所謂“个人物质刺激”的思想来腐蝕工人。这样，实际上就不可能真正發揮人的作用。現代修正主义者口头上說“关心人”，实际上是企图扼杀人們的革命精神，使社会主义企业蜕化变质，使社会主义經濟基础蜕化变质。

我国人民正在傳頌着大庆油田的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从根本上說来，大庆精神就是企业建設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就是“人的因素第一”的精神。

大庆油田是我国新建的一个現代化石油企业。这个企业的建設，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开始进行的。器材設備严重不足，交通运输条件很差，甚至沒有机修工厂，許多用品常常供应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大庆职工发揚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傳統，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絲毫不計較个人的利益，心甘情愿地吃大苦、耐大劳，終于征服了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在短短的四年內，多快好省地建設起一个現代化大企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重大貢獻。

大庆的建設表現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完全能够凭借自己劳动的双手，建設好自己的国家。

大庆职工的高度革命干劲是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結合在一起的，他們懂得在战略上要藐視困难，而在战术上要重視困难。例如，在油田勘探和建設中，大庆职工为了判明地下情况，每打一口井，都要取全、取准二十項資料和七十二个数据，保证一个不少，一个不錯。几年来，那里的地质研究人員和工程技术人员，根据大量的第一性資料，反复地进行了无数次的分析、化驗和計算。而这一切是在沒有像电子計算机这一类先进的計算設備的条件下进行的。

大庆油田这个高度現代化企业建設的胜利，当然要依賴于解决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技术問題。但是，从他們的經驗看来，首先的和决定的，作为主要推动力的，是在于貫徹执行党的旨在調动人們积极性的总路綫，在于发揚人們的革命精神，在毛澤东同志的旗帜下，灌輸人們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这就为自力更生地解决重大技术問題提供了前提。正像大庆的同志們自己所說的，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坚信党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如果不是在党的总路綫和大跃进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沒有一股頂得住任何艰难困苦的革命干劲，今天的一切都将是空中楼阁。

大庆油田的領導方面，为了調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企业中开展群众运动，在政治上、經濟上、生产技术上充分发揚民主，不断改善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等等。这里有重大革命意义的，是領導干部和工人一起参加生产劳动。

大庆的領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同組織生产、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相結合的。他們参加劳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七种：（一）跟班劳动，进行調查研究；（二）带着問題跟班劳动，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三）住在比較落后的班組，跟班劳动，帮助落后；（四）在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跟班劳动；（五）在最紧要最關鍵的地方，跟班劳动；（六）生产上遇到复杂情况的



时候，跟班劳动；（七）在人少需要突击生产的时候，跟班劳动。

事实证明，领导干部下到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和群众同甘共苦，直接倾听群众的意见，能够不断地改进领导，改善企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启发职工群众的革命觉悟。这样，就不但更有可能避免官僚主义，也更有可能防止修正主义思想的侵蚀。

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运用“四个第一”的原则。大庆油田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把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同自己企业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而在促进职工群众思想的革命化、发挥人的作用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摸索出一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办法，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有些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把我国各部门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歪曲说成是要使全国各个部门都“军事化”。让这些入随心所欲地去嚼舌吧！中国人民将像大庆职工那样，坚定不移地学习解放军，正确处理人和物的关系，作为建设我们国家的一个必要的推动力。

在处理人和物的关系中，是否把人的因素摆在第一位，这不是小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从两方面歪曲人和物的关系：一方面，片面地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否认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的存在，这就产生“只见人不见物”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片面地夸大物的作用，认为人在物的面前，始终只能处于无能为力的被动地位，不能积极地掌握物质世界的规律性，从而改造物质世界，这就产生“只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唯物论倾向。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是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时候，这样说：“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sup>①</sup>

资产阶级统治者宣传“机器统治人类”，是企图凭借他们所有的机器永远保持他们对于劳动人民的统治。他们夸大武器的作用，则是为了使劳动人民不敢起来反抗他们的暴力统治。他们用这种没落的世界观来观察事物，同时也用这种世界观来毒害劳动人民。在劳动人民中间，谁如果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谁就不可避免地会解除自己的精神武装，而成为没有志气、没有骨头、不敢有所作为的庸人懦夫。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既反对主观唯心论，也反对机械唯物论，认为人和物这两者是统一的，而人的作用占主导地位。这是科学的世界观，革命的世界观。革命的人民，只有用这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扫清庸人懦夫的世界观及其影响，才能使自己无论在革命中或者建设中，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气概，去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将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sup>①</sup>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33—1134页。



# 我軍指战員怎样学习毛澤东著作

肖 华

毛澤东同志的思想所以正确，所以經常保持生气勃勃的力量，就是因为他經常地、不断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革命实践結合起来，而从革命实践出发，創造性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以毛澤东思想为建軍、作战和一切行动的指針，努力学习毛澤东著作，从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傳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员会扩大會議，根据林彪同志的提議，又向全軍发出了“高举毛澤东思想紅旗，把毛澤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的号召。全軍聞風而动，立即掀起了学习毛澤东著作的热潮。几年来，全軍在毛澤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四个第一，发揚三八作風，开展創造四好連队运动，进一步推动了学习毛澤东著作的热潮。全軍指战員学习毛澤东著作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經常，越来越有成效，形成了規模宏大、持久不懈的群众运动。一九六三年，宣傳和学习雷鋒、南京路上好八連的活动，更使广大指战員清楚地看到，雷鋒和好八連的成长，就是学习和运用毛澤东思想的結果，因而更加提高了学习毛澤东著作的积极性。“人人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成为广大指战員的自觉行动。从前方到后方，从內地到边疆，从机关到連队，从干部到战士，到处都在认真学习。平时学，战时学，上課学，业余学；在軍营里，在工地上，在行軍途中，在舟車道上，以至休假探亲，很多人都是“毛选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工作多，挤不倒；文化低，难不倒。全軍上下，对毛澤东同志怀着无比敬爱，对毛澤东思想怀着强烈的无产階級感情，从毛澤东著作中找武器，学本領，改造自己，改造客观世界，使全軍指战員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使全軍各項工作蒸蒸日上。

馬克思說，理論一經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广大指战員学习毛澤东著作，用毛澤东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就使我軍在非常无产階級化、非常战斗化的建設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全軍指战員，特别是連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毛澤东著作的主要收获是：

第一，进一步促进了全軍人員的思想革命化，提高了广大指战員的政治思想觉悟。毛澤东同志对革命者所提出的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站穩无产階級立場，分清敌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拣重担子挑，毫不利己，等等要求，成为广大干部、战士所向往、所追求、所身体力行的目标。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鋒，用他火花四濺的一生，实现了这个目标。千万个雷鋒，



数不尽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犹如山花烂漫，万紫千红。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广大青年战士正在成长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模范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为了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甘愿贡献出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他们以艰苦为荣，以助人为乐，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他们不光看到身边的事情，而且“站在连队里，看到全世界”。

第二，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时期所提出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更深刻了。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华大合唱面前，在国内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看得清，站得稳，顶得住。南京路上好八连，十几年来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艰苦奋斗，永不褪色，是为人熟知的一个例子。还有，解放军“钢八连”和公安部队“红色前哨连”，也是这样。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头脑，击退了阶级敌人糖衣炮弹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始终坚守了自己的战斗岗位。毛泽东思想把我军锻炼成一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的人民军队。可以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战士们反映：“毛主席著作真正好，字字句句都是宝。战士读了觉悟高，立场坚定站得牢。台风刮不动，霹靂震不倒。”

第三，四个第一、三八作风越来越落实，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越出越多。凡是四好连队，都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而学得好的连队；凡是工作做得出色的干部，都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而学得好的干部；凡是五好战士，都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而学得好的战士。

第四，练出了硬功夫、真本领，打仗过得硬，什么困难都不怕。连长郭兴福，在训练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战士带着阶级仇恨、带着敌情观念、带着英雄形象、带着任务摸爬滚打，把一个个战士训练得像生龙活虎一样。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各部队贯彻了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进行训练的精神，练出了像鲍寿根那样的空中神炮手，打出的炮弹跟长了眼睛一样；练出了像袁西乐那样的神枪手，掌握了过硬的射击技术；练出了像硬六连那样的具有无产阶级硬骨头作风的连队；练出了大批被称为考不垮、难不倒的“铁优等连队”；练得像西藏、新疆边防部队那样，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既有二百米硬功夫，又有高度的政策观念和纪律性。

第五，提高了领导水平，改善了工作方法。凡是毛泽东著作学得好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作风就好，方法就对头，工作就能做到节骨眼上。他们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善于抓住两头（上边的东西及时向下传达，加以具体布置；下边的东西很快反映上来，加以具体解决），没有疲沓、散漫、松垮、拖拉的现象。许多这样的机关，有的被称为“战斗作风好的司令部”，有的被称为“面向连队的政治处”，有的被称为“送东西上门的后勤处”。

第六，使我军科学技术人员走上了又红又专的道路。我军科学技术人员学习了毛泽东著作，提高了阶级觉悟，就有了排除万难、攻克尖端技术的坚强决心，树立起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就在军事科学技术战线上大出成果，大出人材。

全军指战员，特别是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毛泽东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行动



的實踐，給我們一些什麼啟示呢？

毛澤東著作，具有高度的理論性，然而深入淺出，講得透，講得活，容易為廣大幹部、戰士所理解，所接受，所運用。廣大指戰員把毛澤東著作學好了，把毛澤東思想掌握了，就能更好地理解毛澤東同志怎樣運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來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問題，就可以啟發我們更好地領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精神實質，更好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解決自己在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學習毛澤東著作是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捷徑。

今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按語指出：“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已經證明了的，是任何人也不可能抹煞的。毛澤東思想受到全世界的革命人民的歡迎，他們從中國革命的經驗中，從毛澤東同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中，獲得了革命的武器。這是很好的事情，只有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不高興。”事實正是這樣。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我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教條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我國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指針，也是我軍建設和一切工作的指針。學好毛澤東著作，用好毛澤東思想，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首要任務，是四個第一落實的主要標志，是培養三八作風的思想基礎，是創造四好連隊的根本保證。政治掛帥，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掛帥。抓住學習毛澤東著作，運用毛澤東思想，就抓住了我軍建設的根本環節。

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在全黨全民全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澤東思想鼓舞著全黨全民全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善於運用毛澤東思想來回答和解決部队的現實問題，是最高明的政治工作。

總之，毛澤東思想，是“糧食、武器、方向盤”。學習它，運用它，放在哪裏都准，用在哪裏都靈。違背了它，千言萬語，離題千里，我們的什麼工作都做不好，我們的革命事業就會失敗。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一個單位、一個人的思想狀況如何，工作狀況如何，首先要看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是不是舉得高，毛澤東著作學得好不好。要學得好，就要對學習毛澤東著作，有充分的認識，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有堅強的決心；在執行任務、處理問題的時候，要想到運用，而且要學會善於運用。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這是軍委和林彪同志的號召，也是廣大指戰員從學習毛澤東著作的親身體驗中得出的結論。

## 二

我軍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指導思想和根本方法，就是林彪同志提出的“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



林彪同志提出的这种活学活用的方法，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原则的具体化。毛泽东同志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sup>①</sup>林彪同志提出活学活用，就是要我们从国内国际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带着问题向毛泽东著作请教，需要什么学什么，用什么学什么，使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同当前的斗争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学习有无成绩和成绩是大是小，主要看我们会不会用，用得怎样。活学活用，就是要求广大官兵比较深刻地领会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采用这种学习方法，就可以一扫理论学习中的沉闷空气和书生派头，充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干部、战士普遍反映，这样学法，“学得快，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过去有些人曾经感到学了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常常是由于他们没有把学和用结合起来，不是活学活用，学用一致，而是读死书、死读书。

实践证明，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方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变为广大官兵手中武器的正确道路。凡是按照这条路子走的，学习效果就好；离开这条路子，学习效果就差，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雷锋的“问题——学习——实践——总结”，廖初江的“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想问题，碰到问题找毛主席著作”，丰福生的“五多一结合”（多读、多想、多比、多用、多记，学与用相结合），黄祖示的“对照检查，边学边做，反复学用”，等等，具体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体现了活学活用的精神。

带着问题学，带着什么问题呢？就是带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就是带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对全军来说，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带有共同性的，例如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任务中提出的问题，部队中心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带有普遍性的思想问题，等等；也有一些是各个单位、各种业务部门和每个人思想上、工作上需要解决的特殊性问题。任何人只要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学习，就总是有问题可带的。因此，带着问题学，是人人可用的学习方法。曾经有人认为，这种学习方法只适用于战士和理论文化水平低的基层干部，而不适用于中上层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机关院校的同志。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带着问题学，是不是忽视系统读书呢？不是的。经验证明，越是带着问题学，对读毛泽东著作越是如饥似渴。这几年，干部、战士对毛泽东著作读的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今天带着问题学这些文章，明天带着问题学那些文章，日积月累，越学越多。不少同志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内阅读了《毛泽东选集》，有的还读了几遍。事实证明，这是阅读《毛泽东选集》的好方法。带着问题学，虽然每次学的只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个部分或那一个部分，但是，从一个问题的学习中比较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可以触类旁通，领会和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学得多了，就可以逐步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带着问题学并不是说不要系统地读书。特别是我军高级干部，不但应当带着问题多学一些毛

<sup>①</sup>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7页。





澤东著作，而且应当带着問題多讀一些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我們学习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是脱离实际，为系統讀書而系統讀書。如果脱离现实斗争的需要，无目的地去讀書，去追求什么“完整”、“系統”，根本想不到学是为了用，这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好的。这种使理論和实际相脱节的学习方法，是我們所坚决反对的。

下面几点，就是我軍指战員，特别是連队干部和战士活学活用毛澤东思想的一些做法。

### 从实际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

活学活用毛澤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做法，就是从实际出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具体說来，第一、从国内外階級斗争形势和党的政策出发，进行什么政治运动和重大政治教育，就学什么。第二、从部队的工作任务出发，做什么就学什么。第三、从部队和个人的思想情况出发，要解决什么思想問題，就学什么。不仅在問題发生以后学，而且預見到可能發生的問題，事先学，把学习毛澤东著作作为解决思想問題的銳利武器，是进行經常性思想工作的中心內容。这种做法的关键，就是领导机关要做好調查研究，确切了解实际情况，同时要发动大家根据各自的需要选学有关的文章和章节，摸准“的”，选好“矢”，确实做到用毛澤东思想之“矢”，来射实际工作和思想問題之“的”。每当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党和国家頒布重大方針政策的时候，部队中心任务轉換的时候，某种思想問題带有普遍性的时候，各級政治机关就要针对情况，及时下发学习提示，指出学习重点，介紹学习文件，指导学习。在这样做的时候，許多领导机关还經常根据当前斗争形势和工作的需要，提出毛澤东著作中一些有关的論点，組織文化程度比較低的基层干部和战士进行学习。許多連队和班、排，都有一块語录小黑板，駐軍挂在墙上学，行軍背在身上学，练兵摆在操場学，生产竖在地头学。大家体会到，学語录，学毛澤东同志的一些突出的、扼要的論点，有针对性，便于記，便于用，费时少，見效快，是文化程度比較低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学习毛澤东著作入門的一种好方法。

党中央、毛澤东同志关于目前形势和我軍建設的方針、政策和指示，軍委和林彪同志关于我軍建設的指示，是理論联系实际的榜样。在多数情况下，全軍指战員都是把毛澤东著作同这些指示結合起来学的。这些指示一經下达，部队就聞風而动，及时传达，认真学习，认真研究，认真領会，結合实际情况，訂出有效措施，全面地系統地貫徹执行。重要的指示，还由负责同志到連队原原本本地宣讲，让党中央、毛澤东同志的指示直接同广大群众見面，組織干部、战士联系实际进行討論，然后解答問題。这样学，能够使干部、战士及时地深刻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針政策，紧紧跟上党中央、毛澤东同志，并从中学到毛澤东思想的新內容，获得政治上、理論上的提高。

### 讀書、檢查、实践

学习毛澤东著作，对每个人的思想來說，应当是一个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



的过程，是思想领域里不断革命的过程。因此，要把读书、检查、实践结合起来，认真读毛泽东著作，在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并且把它运用到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实践中去。这种做法体现了我们党的传统的整风学习的精神。好八连的“一读、二议、三对照、四行动”，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概括。

要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必须养成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好学深思的习惯。许多同志的经验是要读、谈、想、写，尤其重要的是想。每读一篇文章，都要想想毛泽东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样来分析解决问题的，想想它的基本精神是什么，想想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对改造自己、改进工作有什么启示，等等。

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把毛泽东著作当作镜子来对照检查自己。最怕的是“读书千百篇，思想不沾边”。怎么对照检查？就是看看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讲的，自己是怎么想的；过去是怎么做的，今后应该怎么办。有些单位在组织学习的时候，除了提倡同志检查自己的思想行动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外，还用先进人物、先进单位的事迹，对比自己，看看他们怎样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实际行动，找出差距，努力赶上。

实践是检验学习效果的标准，又是学习的继续和发展。对照了，检查了，还得付诸行动。把读书、检查、实践三者结成一个整体，真正做到“看在眼里，印在心里，讲在口里，做在手里”，并且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进一步体会。读书、检查、实践，再读书、再检查、再实践，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提高，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才能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 抓重点，反复学

学习同打仗一样，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重点的东西要反复学，不反复学，就不能精通。林彪同志说：“要勤学多练。多练，就是反复地学，学深学透，多实际运用，不要学一下就过去。”由不懂到懂，由懂得少到懂得多，由领会精神到实际运用，是一个反复学、反复用的过程。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也要通过反复学、反复用来解决。同是学习一篇文章，每次带着的问题不同，角度不同，学习的收获也就不同。实践经验、思想修养、理论文化水平提高了，学习的理解程度和应用范围也会有发展。学习一次，实践一次，都会有新的体会，新的提高。

要反复学的重点东西，就问题和观点来说，主要是毛泽东著作中所阐明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无产阶级意识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修养，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就同基层干部、战士的思想修养和工作作风关系最密切的文章来说，主要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和观点，大家都反复研究，这些文章，基层干部和战士总是翻来复去地读，十遍几十遍地读。他们把这些文章当作改造思想、建立革命人生观的指针，当作一切工作和日常行动的准



绝。许多同志说：“我要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所以我要学习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 以党的历史为线索进行学习

我军各院校普遍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线索，来学习毛泽东著作。这种办法，有些部队也在使用。党的四十多年的斗争历史，最好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以党史为线索进行学习，能够更好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学到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更好地了解毛泽东同志怎样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学习党史，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泽东著作，要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中心，即以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中心，通过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形势和重大事件的基本情况，了解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实质，了解毛泽东思想是怎样在同党内各种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和不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了解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和作用。

我党我军的革命传统，是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形成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生动体现。许多基层单位在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时候，还组织大家阅读有关的革命回忆录、烈士传记、英雄事迹等辅助读物，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同进行传统教育结合起来。这样学，既有理论又有形象，很受大家欢迎。

### 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结合起来学

我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和文化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在着重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同时，还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根据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从一九六二年起，全军高级干部根据不同情况，开始了有计划地、比较系统地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几本、十几本到几十本经典著作。在这个学习中，又重新精读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例如在学习《共产党宣言》的同时，阅读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在学习《国家与革命》的同时，阅读《论人民民主专政》、《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等。把毛泽东著作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结合起来阅读和思考，能够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能够加强对这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 同反面材料对照着学

近几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在一系列的革命原则问题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能够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干部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时候，常常把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言论，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以及帝国主义者评价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拿来对照加以分析比较，看



看馬克思列宁主义同現代修正主义爭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怎样讲的，毛澤东同志、現代革命者、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怎样讲的，新老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者是怎样讲的。这样，才能够分清真理和謬誤，增强反对現代修正主义、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和信心。这是在斗争中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澤东思想的一种好办法，是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一种好办法。

### 三

活学活用毛澤东思想，在学习問題上打破了少数人关在房子里讀書的观念。学习毛澤东著作，是全軍指战員自觉的迫切要求。学习毛澤东著作，就是学革命，干革命，就是在广大群众中进行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运动。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两种改造互相促进。因此，在领导工作上，决不能把这一学习停留在課堂上，停留在少数人中間，而要发动群众，因势利导，领导广大干部和战士进行学习。

领导广大干部和战士学习毛澤东著作，重要的一环，就是不断启发和增强群众的学习自觉性。有了自觉性，就会出时间，出毅力，出方法，出效果。启发自觉性，要靠宣傳，靠教育，靠結合实际反复讲解学习毛澤东著作的重要意义。但是，又不能光停留在动员学习和一般号召上，而要說学就学，說干就干，从学和干的过程中，繼續提高群众的自觉性。事实证明，学有所得，从学习中得到了好处，就学进去了，学习的自觉性也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巩固。

学习既依靠自觉，又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建立制度和启发自觉是相輔而行的。問題在于，学习制度、学习計劃、学习組織形式，都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应强求一律。以干部学习为例，有在职学习，有离职集訓，以在职学习为主；在职学习有的是規定每周学半天，有的是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学几天。有集体学习，有业余自学。学习的内容和文件，有統一安排的部分，有个人选学的部分，等等。总之，目的是使学习的組織领导处处符合客观实际，不是一般化的领导。这样，就便于貫徹活学活用的原則，学习也能持久。

学习毛澤东著作，是我軍建設中一件带有方向性根本性的大事。各級领导机关都做到抓住不放，反复落实。军委每年的工作安排，总政治部每年召开的政治工作會議，部队每年四好运动的总结評比，都把組織学习毛澤东著作放在首要地位。各級领导机关，特別注意抓团以上领导干部的学习。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对下面干部和战士的学习是一种最实际、最有效的领导和督促。还要注意大力宣傳群众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培养大批学习骨干，用活的榜样，把全軍的人員都带动起来。

总起来說，毛澤东思想的旗帜要举得高，要采取一套活学活用的学习方法，要加强领导。这些，就是人民解放軍学习毛澤东著作的几点主要經驗。今年，我軍活学活用毛澤东思想，又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新阶段。全軍指战員，决心在全国大学毛澤东著作的热潮中，发揚成績，糾正缺点，虛心向地方学习，使我軍对毛澤东著作的学习，更加普遍，更加經常，更有成效。



# 学习理論的目的全在应用

王承放

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学习毛澤东著作的目的，都是为了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矢”，去射我們思想上和工作上的“的”，也就是为了指导实践，为了应用。

用，是学习理論的目的，也是檢驗学习成績的标准。“如果你能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說明一个两个实际問題，那就要受到称贊，就算有了几分成績。被你說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sup>①</sup>在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学习毛澤东著作的时候，不管你采取什么学习方法，也不管你先讀什么，后讀什么，讀多讀少，但是，学为了用，学了要用，却不能有所不同。

学結合用，能够打开人的眼界，使人看到真理的光輝，受到真理的哺育。从学得到，用得上，进而才能学得透，用得熟。这一条，对任何人并无例外，也不曾有过例外。

怎么用？要像列宁說的，把学到的原理原則，变成与工作直接联系的活生生的东西，变成实际工作的指針。要为了解决階級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当中的实际問題，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从毛澤东著作当中，去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解决实际問題，說的是要改造客观世界，要改造主观世界。用，是包括这两个改造在內的。改造主观世

界，經常用毛澤东思想去打扫我們思想上的种种灰尘，目的正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有革命化的思想，才有革命化的行动。思想朝气蓬勃，工作才能虎虎有生气。主观世界的改造沒有止境，客观世界的改造也沒有止境。用无止境，学也沒有尽头。这样边学习，边改造，边应用，学用結合，活学活用，反复地学，反复地用，路子对了，就能每学一次，思想登上一个新的境界，工作登上一个新的境界。

学习理論，从不懂到懂，从知得少到知得多，这是一个过程。这样的情形是常有的：原先以为已經都懂了的，經過一段实践应用，又发现过去懂的还很肤淺，很片面，甚至根本还没有懂。每一次这样的新的发现，也常常是进一步領悟真理的开端。这种領悟真理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努力程度不同，可以有长有短。但是，看到这个过程很重要：一則不会因为开始的无知、少知而妄自菲薄，畏葸不前；二則又不会因为知的多而驕傲自滿，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这种領悟真理的过程，是学的过程，也是用的过程，是学用結合的过程。領悟真理，要从为了用开始，在用中再領悟，又在用中来檢驗的。如此反复

<sup>①</sup> 《整頓党的作風》。《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17頁。



学，反复用，思想不断得到改造，认识不断得到提高，工作也就更有成效。

还要提倡思索。精神食粮只有通过思索才能消化，才能与自己建立起血肉的联系。领悟真理，一思二思都不够，还要“三思”，要深思熟虑。只知死背硬记，懒得思索，并不能使人的头脑得到武装，使人变坚强、变聪明的。思索又要结合应用，要为了应用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脱离实际的架空的思索，空空洞洞，是无济于事的。

“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对事物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分析，认识事物的本质，找出事物的特殊规律，提出解决的办法。这样才能耳聪目明，分析的结果也才会方向明，决心大，方法对。如果以抽象的概念代替具体的分析，用一般规律代替特殊规律，就不能提出问题，更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用，就成了一句空话。列宁说：“不用相当的独立工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sup>①</sup>。这里说的独立的工夫，包含具体分析的意思。独立

<sup>①</sup> 《几个争论问题》。《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6页。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必须有两股劲，一股是挤劲，一股是钻劲。挤，是善于挤出时间来学习；钻，是刻苦钻研，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

我们有许多同志能够经常坚持学习理论，并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但是，也有一些同志，总是不能坚持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曝十寒。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不是他们不知道学习理论的好处，二不是他们没有学习理论的愿望，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他们有时心血来潮，也订计划，学一阵子，但是

一遇到工作忙，有什么事情打岔，或者学习中有什么困难，就会松懈下来。

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当人们还没有养成学习理论的习惯的时候，学起来免不了

会有点勉强，会感到是一种“额外负担”。问题在于要经过自觉的努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党章规定的义务，对于广大革命干部来说，是提高自己的觉悟水平、做好革命工作的根本保证。我们应该根据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自觉地去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大家知道，马克思原来是研究法律的，对经济问题并不熟悉，他之所以研究经济问题，正是为了实践斗争的需要。他说：“一八四二——一八四三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

## 挤和钻

苏  
思  
本



的工夫，当然不是说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要不，现象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会坠到十里雾中，迷失方向，走上歧途。那离着应用，就更远了。

养成分析的习惯，学会“有的放矢”，也要有一个过程。没有经过什么锻炼，一下子就想做到箭无虚发，矢矢中的，是不可能的。在分析当中，错了的时候也会有的，这并不是要紧，只要方向对头，勤学、勤练，射中率总是越来越高，不会越来越低。

学会分析，学会应用，并没有什么奥秘

处。奥秘感觉的由来，说到底，还是由于学习脱离了应用。当然也不那么轻而易举。轻而易举的想法，说到底，也是学用脱节所产生的一种误解。毛泽东同志说：“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sup>①</sup>懂得了这个道理，以上的误解就会消除。也就是说，归根到底，还是要在学用结合上刻苦勤奋地用工夫。

<sup>①</sup>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71页。

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sup>①</sup>在十九世纪初叶，列宁为了摧毁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冒牌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研究哲学上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透彻地研究了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读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本来不熟悉战争，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才逼着我们去研究战争的规律；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又逼着我们去学习经济建设理论。目前的国内外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尽最大的努力。

挤时间，首先要在工作中去挤。工作同学习理论究竟有没有矛盾？这要看怎样来处理两者的关系。如果我们善于带着工作中的问题去学习理论，通过学习理论提高了认识

水平和工作能力，改进了工作，那末，两者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相互促进的；如果我们不善于结合工作、结合自己的思想去学习理论，看不到学习理论的好处，就可能把工作同学习理论对立起来，两者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如果在工作中树立紧张的作风，合理安排工作，就有可能在做好工作的前提下，挤出一部分时间来学习理论；如果工作拖拖拉拉，秩序紊乱，或者陷入文牍主义、事务主义，就很难挤出时间来学习。事情全在于自己的安排。

要想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还要合理安排自己的业余生活。在业余时间內，正常的文娱体育活动是必需的。没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充沛的精力，不可能很好地坚持学习。但是，业余时间只有那么多，一秒钟也不能增加，理论学习和文娱体育活动又必须有个合理的安排。在安排中，我们应该把理论学

<sup>①</sup>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8页。



习摆在第一位。大家知道，列宁很重视锻炼身体，喜爱各种体育活动，很爱滑冰，又很重视学习各种外文，喜爱拉丁文课。后来，他发现滑冰和学拉丁文占去他过多的时间，影响他阅读有关工人阶级斗争的、有关革命的书籍，就把这两种爱好放弃了。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由人来支配自己的习惯，而不要由习惯来支配人。

一个人在业余时间，干什么，不干什么，多干什么，少干什么，往往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安排。如果在这种安排中，本来没有学习理论的时间，每天要挤出一两个小时，半个钟头用来学习理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要经过思想斗争。既要同精神上的松懈和思想上的怠惰作斗争，又要同妨碍自己学习理论的旧习惯作斗争。这种斗争在开始时总会给人带来某些烦恼的。但是，只要旧的习惯破除了，新的习惯建立起来了，这种烦恼感自然就会消除。

学习理论，不但要挤，而且要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武器，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古董来欣赏，当做教条来膜拜。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但是，要真正做到能够运用理论，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前人的经验表明，只有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刻苦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掌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办到这一点。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世间有些事情可以请别人帮忙，自己少花一点精力。至于学习理论，却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能依赖别人。这种努力，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不花费心血，休想取得

成效。刻苦钻研就是捷径，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就是捷径，反复阅读，耐心琢磨，直到弄懂为止，就是捷径。列宁谈到研究国家问题时，正是讲的这个意思。他说：“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sup>①</sup>

列宁在这里谈到的“再三研究”，“从各方面思考”，应当引起我们重视。决不能把刻苦钻研理解为死啃书本，死记名词，不作独立思考。刻苦钻研同独立思考是分不开的。熟读的过程，应该同时是深思熟虑的过程。熟读可以加深思考，深思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所读的内容。读了不思考，就好比和尚念经，口中念念有词，其实什么也不了解。这种读法，我们当然应当反对。

挤和钻，有着紧密的联系。一个人经常挤时间学习理论，不断获得进步，对钻研理论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反之，钻研理论得到了收获，又会增加挤时间来学习理论的决心。如果挤出的时间，不能有效利用，读书像蜻蜓点水，心不在焉，或者在学习中遇到“拦路虎”便灰心丧气，半途而废，学习理论的良好习惯就不会形成。

挤和钻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革命自觉性的问题。每个同志，只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革命自觉性，这个问题肯定是可以解决的。

<sup>①</sup> 《论国家》。《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8—429页。





# 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比学赶帮”运动

——华东地区在工业战线上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几点体会

韓 哲 一

工业战线上的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落后的群众运动，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出现了。这些年来，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比学赶帮”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范围越来越广泛。“比学赶帮”是在工业战线上充分地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有效形式；是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好方法。工业生产中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消除一个差距，在新的基础上又会出现另一个差距。我们经常地、有意识地组织后进单位同先进单位比较，找出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就会激发广大职工不甘落后、努力上进的革命干劲，就会使广大职工认清干劲往哪里鼓，上游向哪一方面去争。也就是说，坚持开展“比学赶帮”活动，就可以迅速地 and 不断地把落后企业提高到当前先进企业的水平，把先进企业的水平变为全社会的水平，使整个工业水平得到提高。

一九六三年六月以来，在华东地区工业战线上，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的“比学赶帮”运动，首先是从学习上海工业先进经验开始的。上海是我国一个老的工业基地，老工人比较多，技术基础比较强，协作条件比较好。上海工业战线上的全体职工，在党中

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各兄弟地区的大力支援下，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近几年，又认真地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结合生产，进一步加强了思想工作，职工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广大职工中，为社会主义建设而生产，钻研技术、遵守纪律、爱厂如家和勤俭节约已经形成风气；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一直没有中断，改造了一些旧设备，创造了一些新技术、新工艺，制造了一些专用设备，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产品品种也有新的增加。随着工业战线上社会主义教育和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开展，很多地方纷纷提出要“学上海、赶上海”。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首先以上海的先进企业为标兵，组织华东各省部分企业，分期、分批地按行业由各省工业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领队，到上海各对口企业进行学习。

从一九六三年六月中旬到十一月底，各省到上海学习的共有四批，包括轻工、化工、纺织、机械、冶金、手工业等行业的六百多个企业（上海对口厂共五百二十多个），六千



多人，学习的产品五百多种，学到了各种先进经验两万多条。这些经验，涉及到工艺、操作、配方、设计和管理工作的许多方面，绝大部分是不要花钱或少花一点钱就可以运用到生产上去，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学习到这样多的宝贵经验，解决了很多企业长期没有过关的技术问题，使学习的人树立了学先进、赶先进的信心。上海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给学习的人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通过这次学习，对更好地调动广大职工奋发图强、刻苦钻研、不断革新的革命精神和树立因陋就简、勤俭节约、重视质量、认真操作以及爱厂如家、遵守纪律的好风气，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下面谈谈我们组织华东各省到上海学习工业先进经验的体会：

**第一，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自始至终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不断地找出跟先进企业及国际水平的差距，不断地克服骄傲自满、畏难保守思想，是组织好“比学赶帮”的根本保证。**

这次学习上海工业先进经验的活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以反浪费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开展的基础上进行的，广大职工的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有了普遍提高，强烈地要求改变部分产品质量次价高和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因此，不论是学的人还是教的人，自觉性高，劲头很大，态度谦虚，刻苦认真，做到了包教、包学，出现了很多生动感人的事例；很多人，为了把先进技术学到手，每天起早贪黑赶三班；有些人，白天在厂内勤学苦练，晚上回到宿舍也是分秒必争，写心得、记笔记、练基本

功；有的人还把学到的经验，整理成系统的资料；有些年老艺高的老工人、老技术人员，也甘心当小学生，拜年纪轻的人为师。很多教的人，为了把经验传授给学的人，不仅在工厂里教，还利用业余时间自动到宿舍去教；有些老师傅对“新徒弟”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不仅教他们练好基本功，还教他们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很多企业，专门调整了班次，抽出了备用设备，为学的人准备了便利实习的条件。这是主导的方面。

由于人们头脑中还残存着非无产阶级思想，学先进经验就不可能没有思想阻力。在组织学习的时候，首先碰到的思想障碍是骄傲自满。这种思想，学的企业和教的企业都有。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学的方面来说：有的企业，夜郎自大，说什么它有“三不学”，小厂不学，新厂不学，不“成套”的经验不学。有的企业，故步自封，认为上海虽然先进，我们也差不多，说不上是“老大”、“老二”，也够得上是“老三”、“老四”。有的企业，唯条件论，强调“可比的指标不落后，落后的指标不可比”。还有的企业认为，产品质量虽然差一些，但是，在市场上还供不应求，这个地区销路不好，别的地区还能销得出去。有些企业提出，学上海可以，反正今天学不会还有明天，至于赶上海，那要慢慢来，短期内办不到。有的人说，要提高质量还可以办到，要降低成本就难办了。有些人，要他重新当徒弟，他感到难为情，放不下架子，只愿“称兄道弟”，不愿拜师学艺。还有一些人有畏难情绪，认为上海技术水平高，条件好，高不可攀，自己学不了。有的人怕别人不会真心实意的教，学不到真本事。



在教的方面：有些企业只看到自己先进的一面，把自己看成是“小西天”，洋洋自得。有少数企业存在着保守思想，生怕别人把它的“看家法宝”学了去，怕别人赶上自己，超过自己，总想留一手。

在“比学赶帮”运动中，克服这些自满、畏难和保守等思想，是扫除障碍，组织好学先进、帮落后的第一关。在学习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思想活动，例如，有些人满足于“一语道破”的经验，不愿寻根究底，不愿扎扎实实地练基本功。有些人急于求成，好高骛远，有些人“心挂两头”，想草率收兵。这些学的人和教的人的思想，集中起来就是肯不肯承认落后的问题；敢不敢揭开落后盖子的问题；愿不愿虚心学习先进的问题；有没有勇气赶先进的问题；能不能真诚帮落后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应当如何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企业与企业、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还没有弄清楚。

为了解决这许多思想障碍，在开始学习之前，对参加学习的人要首先在省内集中学习几天，由省的负责同志向他们说清楚学先进、赶先进的意义，端正学习态度。特别指出，学先进、赶先进，缩短先进和落后之间的差距，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改变我国工业落后面貌，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实际行动。组织大家反复地讨论，提高认识。这时，有一部分人还没有完全解决思想问题，他们中间有的人在指标上服输，但是，在思想深处还有保留，个别人甚至想到学习的企业里挑毛病。对这些人，是通过下厂对比，用事实来教育他们。事实打开了他

们的眼界，他们感到不是没得学，而是到处都是“宝”，到处都是“经”，学也学不完。在接受学习的企业里，也要反复向职工进行思想工作，除了讲清楚“比学赶帮”运动的意义以外，要特别强调，对兄弟单位派来的人必须热情接待，必须打破“留一手”的保守思想，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无保留地把经验传授给他们。同时，还要讲清楚，每个兄弟厂都有先进经验，必须趁兄弟厂派人来学习的机会，有组织地发动职工“借东风”，主动地向兄弟厂派来的人请教，请他们“献宝”，相互帮助，取长补短。

对学习发生的一些突出问题，更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例如，苏州安利化工厂和上海珊瑚化工厂，解放前，都是资本家办的厂子，在生产技术上各有所长，互相竞争，是冤家对头。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两厂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保守技术秘密这个历史“疙瘩”，一直没有解开。组织学习前，珊瑚厂曾派人到安利厂去学习生产有机玻璃的先进经验，没有拿到全部的技术资料。这次安利厂到珊瑚厂来学习，厂长把技术资料都带来了，但是，又顾虑珊瑚厂不肯把先进技术向他们公开，怕“吃亏”，采取了等着瞧的态度。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会同上海市化工局和江苏省轻化工厅的领导同志，分别反复地向两个厂的同志进行说服教育。向他们指明，互相封锁技术秘密，是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手段，同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同志式的互相帮助的关系，开展“比学赶帮”运动，正是要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两



个厂在认识到历史“疙瘩”是旧社会所造成的，怕吃亏也是资产阶级“专利”思想的反映，在一次技术交流会上，双方都主动地把“技术秘密”公开了。

总之，“比学赶帮”运动，是一场以先进技术代替落后技术的斗争，是一场先进思想同落后思想的斗争，也是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必须首先抓住思想政治工作，抓住活的思想，以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使学的人勇于承认落后，树立雄心壮志，敢于赶先进；才能使教的人大公无私，打破“行会”思想，诲人不倦，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才能真正做到教学相长，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第二，以产品为对象，分析对比，找出差距，抓住主要矛盾，明确学习目标，是制定少而精的学习计划，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好办法。**

如何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全区性的学先进、赶先进活动，是一个新课题。工作一开头，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各地、各企业提出的学习计划是比较笼统的、含糊的。比如：有的企业只是提出学习如何增加花色品种，有的企业要学习经营管理，有的人还要求学习如何当好生产副厂长，还有些企业想毕其功于一役，提出的学习项目多到几十个，有的企业提出学习的对口厂多到八、九个，但是，对口厂究竟生产什么产品还没有弄清楚。过去的教训已经很多，如果按照这样的计划学习，或者事倍功半，或者流于形式。

针对着这种状况，我们认为，要搞好这次学先进的活动，首先对学什么和如何着手学习的问题，必须有个统一的认识，必须有

一个具体对象。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当时的提法是：**以产品为对象，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重点。**为什么要以产品为对象？因为产品是否合乎需要，质量的好坏和成本的高低，同一个企业的技术水平、经营管理以至思想作风都有直接的关系。不可能设想，一个基础工作和基本功不好的企业，能够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也不可能设想，企业的领导人政治不挂帅，作风不深入、不扎实，能够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搞好。也就是说，以产品为对象，通过具体地分析研究产品好坏的原因，就必然会发现企业经营管理和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可以围绕产品找出什么是好的，需要巩固和提高，什么是不好的，需要克服和改善。反之，脱离产品来谈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就往往陷于空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以产品为对象，应当从找差距入手，采取分析对比的方法。**对比，实际上就是调查研究。**对比，一定要比深、比透，既要与本厂历史上最高水平比，也要与先进的企业比；既要重点的比，又要全面的比；既要比后果，又要比前因；既要比技术经济指标，又要比操作、比管理；既要比思想，又要比实物；先进的企业还要和国际先进水平比。比的结果，就可以全面地暴露矛盾，从大量的矛盾之中，就可以找出主要矛盾，从而明确主攻方向，制定少而精的学习计划，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分析对比，找差距，不仅在学习开始、订计划时要这样做，而且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也要这样做。学中有比，比中有学，比的越深，学的越透。例如，南京有个无线电厂生



产的五灯收音机，交流声大，声音不真，防潮性差，返修率高，外表也不美观，这些质量问题，长期没有解决。这次他们到上海一个无线电厂学习，通过全面对比分析，发现在工艺、操作、材料、配方、装配和检验等六个方面都存在着差距，但是，关键在哪里，不明确。这时，他们又按学习项目，逐道工序，详查细看，对比分析，找出了变压器电阻绝缘不好，是影响收音机性能的关键。但是，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解决，还是个问题。他们又进一步地搜集资料，并结合本厂的情况，进行反复研究，一步比一步深入，终于找到了解决关键问题的办法。

通过分析对比，还可以进一步克服盲目自满，激发学先进的热情。特别是对比实物，震动最大，真是“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目前，由于各地对产品的质量掌握不同，检验、计算方法也不一致，如果仅从指标上来分析，还不能确切的反映实际情况，尤其是一些综合性的指标，更是如此。例如：杭州有个布厂生产的棉贡呢正品率是百分之九十八，上海有个布厂只有百分之九十。从指标上看杭州厂先进，因此，杭州厂开始有些骄傲自满情绪，怀疑上海厂是否有经验可学。经过实物对比，杭州厂带来的两匹正品棉贡呢，按上海厂的标准检验的结果，一匹是二等品，一匹是三等品，这才大吃一惊，承认落后，积极学习了。

找到了技术经济指标上的差距，切不可就事论事，还要深入生产实践，蹲下来，钻进去，透过指标上的差距，进一步从思想作风上、经营管理上去找原因。经验证明，凡是这样做的企业，效果都比较好，真正地达

到了“知己知彼”，“有的放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子。例如：江西有个电机厂，这次到上海革新电机厂学习，这两个厂都是中型的综合性电机制造厂，称得上是“门当户对”。通过对一九六三年第二季度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分析对比，江西的电机厂生产的电动机，不仅质量不好，其他各项指标都落后于上海革新电机厂。全厂总产值低百分之五十三，工人劳动生产率低百分之五十五，平均每台电动机成本高百分之三十八，上缴利润只相当于上海厂的百分之零点一。为什么差距这样大？江西的电机厂的同志开始十分苦闷，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深深地感到，指标上的差距来自思想作风和经营管理上的差距。他们总结出上海革新电机厂有五个方面比自己先进：第一，革新电机厂的工艺装备力量强，工艺方法先进，长期坚持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制造专用设备、改造旧设备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第二，革新电机厂在职工中间不断地进行“质量第一”的教育，经常召开质量分析会议，为了保证质量，从原料、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整个生产过程道工序把关；第三，革新电机厂的职工普遍树立了勤俭办企业和多快好省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的观点；第四，革新电机厂职能科室的设置和整个生产组织，都能适应生产的要求，特别是生产准备工作紧密地与生产作业计划相衔接，下达生产任务时，图纸、材料和工、卡、量具齐全；第五，更重要的是，革新电机厂的思想作风好，领导干部处处发扬民主，并坚持下车间参加劳动，工人劳动纪律好，责任制度健全，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相互扯皮少。他们找到了



这些差距以后，对如何提高思想、改进作风、改善管理，有了深刻的认识，改进的决心也就大了。

从点的情况来看是这样，从面的情况来看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各省到上海来学习的四批企业为例，这些厂在与对口厂可比的五千七百多项技术经济指标中，质量、原料、材料消耗、单位成本、劳动生产率等指标，都与上海厂有很大的差距，如果各省企业赶上上海企业现有水平，不仅产品质量可以大大地提高，而且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原料、材料，增加巨大的财富。各省企业与上海企业之间为什么会有很大的差距呢？有些同志说得好：“千差距，万差距，归根到底是思想作风和经营管理上有差距。”这几年来，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无疑是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比如说，目前还有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有的只注意抓生产，不注意抓思想政治工作，搞政治工作的同志，也不善于通过生产去抓思想，通过抓思想来推动生产。在经营管理方面，有些企业工艺管理混乱，技术监督不严；有些企业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的思想；有些企业缺乏定额管理，原始记录不健全；有些企业的劳动组织不合理，非生产人员过多，效率很低。特别是还有少数企业的领导干部工作作风不深入，不扎实，忙忙碌碌，拖拖沓沓，不钻研业务，甘当外行。显然，这些问题不解决，技术经济指标上的差距，是不可能缩短的。

第三，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跟班劳动，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学，是克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真正把先进经

### 验学到手的有效方法。

过去，有许多企业到先进单位去学习经验，派出学习的人往往不配套，派了工人不派技术人员，派了技术人员不派工人，厂长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学习的很少，严格说来，只是一种参观访问。有的人说，过去来上海学习是“车间看看，科室跑跑，听听介绍，抄抄资料”，就算完了。有的企业，到外地学习还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路，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厂，三分之一的时间玩玩逛逛。这种学习是花了钱，浪费了时间，又学不到东西。这一次，改变了做法，我们强调，学习先进经验必须组成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班子。在人员选派上一定要选择那些思想政治好，事业心强，业务熟悉的人。厂长应当是主管生产的，技术人员应当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工人应当是积极分子或生产能手，而且工种必须与学习内容相适应。这个“三结合”的班子，到了对口厂以后，也不像过去那样，厂长找厂长，技术人员找技术人员，工人找工人，而是结合在一起，跟班劳动，跟班研究，边学边干，下硬功夫，练基本功。工人都要拜师学艺，参加操作。厂长和技术人员都要按照工序，对照工艺，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问题。按计划内容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学，学习一项，小结一项，学好一项，再学一项。

实行“三结合”，干部跟班劳动，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在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中实行“三结合”，好处是：厂长跟班劳动，耳闻目睹，体会深刻，推广先进经验容易下决心；技术人员跟班研



究，理論与实际結合；工人参加操作，对先进經驗能說又能做，既能学到知識，又能学到实际操作本領；成套地來人，成套地学，回去之后就可以成套运用。例如：福建泉州蓄電池厂，为了解决蓄電池极板的缺口問題，一九六一年底曾派技術人員到上海蓄電池厂学习澆鑄极板的新工艺。学习回去以后，提出了保证极板的质量必須提高澆冒口的建議，但是，这样做費工，工人思想不通。由于厂长不懂得这项工艺的作用，就沒有支持技術人員的意見，新工艺也就沒有采用。这一次，他們組成了“三結合”的班子，到上海蓄電池厂学习，其中有个項目还是这个澆鑄极板的工艺，但是，工人动手干了，厂长亲自看了，对提高质量确实有效，認識才取得一致。徐州淮海皮革厂，在一九六三年三月，曾派技术科长到上海联合皮革厂学习把次山羊皮做成好革的經驗，由于只看看資料，学学理論，沒有参加实际操作，因此在推广时，工人提出原料发粘不好干，科长也沒有办法，只好另派工人去补课。工人学习操作經驗回来以后，由于厂长体会不深，支持不够，始終沒有推行开。这次，厂长同技术科长和工人“三結合”一起学习，学到了成套的先进經驗以后，厂长亲自主持推广工作。到十一月底，学到的十五項經驗，已有十三項运用了，山羊皮革十一个质量指标，已經有十个达到了部頒标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四，成本降低了百分之十六。有些指标还赶上或者超过了上海对口厂的水平。

这次組織学习，由于实行了“三結合”，特别是抓住了厂长跟班劳动、跟班研究这个重要环节，大大地提高了工人、技術人員的

責任感和积极性，密切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有的厂长說：“过去在厂里虽然也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但是沒有結合好，經過这次学习，才真正知道了怎样‘三結合’。”有的工人对厂长說：“如果在家里也是这个样子干，咱們厂子的生产早就搞好了。”

通过这次学习实践，大家对中央号召干部参加劳动的偉大革命意义，也有了切身的体会。进一步認識到实行“三結合”，干部必須参加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地了解生产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及时地同群众商量，通过群众路綫，解决問題。这是克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搞好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也是干部又紅又专的具体途徑。

**第四，工业管理部門的負責干部要参加学习，面向基层，为生产服务，是领导好“比学赶帮”运动的組織保证。**

要提高一个企业的管理水平，或者提高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不但要依靠这个企业本身不断地努力，各級工业管理部門也必須不断地改进领导作风，面向基层，树立为生产服务的观点，为企业創造必要的条件。从这一点出发，我們組織了各級工业管理部門的干部参加了这次学习上海先进經驗的活动。这种上下結合的办法，是一个好經驗，不仅加强了对这次学习的組織领导，鼓舞了职工的士气，增强了学习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使工业管理部門的干部，通过学习，具体地認識到自己的弱点，学习了別人的长处，进一步体会到提高工业管理水平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学习的組織领导方面，这次突出的特



点是，各級工业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亲自参加领导学习，組織领导小组，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盘地安排学习计划，具体地领导学习活动，以及保证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领导小组除了自始至终地抓思想政治工作以外，还认真地审查了学习计划，凡是计划订得不具体、不落实的，都重新修改落实。在人员組成上，不符合“三結合”要求的，即使到了上海，我們本着一絲不苟的精神，也經過劝說、动員，进行調整。为了督促和檢查教学的效果，在学习的后期，领导小组的成員同对口厂的有关人员一起，特別认真地抓了鉴定和驗收的工作。鉴定、驗收，实际上就是“考試”，主要是檢查学到的先进經驗是否能够运用操作，是否能够有条理的說明技术原理，关键項目是否学深、学透，学习总结是否作好，贯彻先进經驗的措施是否切合实际，等等。鉴定、驗收不合格的，还要“留級”补课。

这次学习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評比、大檢查、大摸底，对工业管理部门改变领导作风，提高管理水平，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很多同志体会到要把本地区、本部門所屬的企业办好，必須結合生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认真做好人的工作，充分地調动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干劲和生产积极性；发揚艰苦奋斗，勤儉办企业的精神，加强經濟核算，讲究經濟效果；坚持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自力更生，装备自己；树立质量第一思想，精益求精，以高标准要求自己。

工业管理部门的負責干部参加学习，对如何面向基层，如何更好地为生产服务，切

实合理地解决企业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認識。比如，过去对下达计划，固定生产协作关系，組織原料、材料和燃料的定点供应，充实技术力量以及解决必需的技术組織措施費用等等，总是拖拖拉拉，不能及时解决。现在認識到这都是管理部门的經濟技术业务，应该积极主动地办好，为基层企业建立正常生产秩序創造条件。目前，各省工业管理部门正在积极着手解决这类問題，对巩固学习成果，推广先进經驗，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上面所談的，只是我們在組織学习中几点初步体会。当然，这次組織学习也还有不少缺点，特别是对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工业管理方面的經驗，全面地、系統地学习不够，在深入开展“比学赶帮”的运动中，需要补上这一課。

随着“比学赶帮”运动广泛、深入地发展，目前华东地区工业战线上，已經形成一个你追我赶、我学你帮的热潮。今后，我們一方面要督促各省把已經学到手的經驗，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地加以推广，使其在本省开花結果。另一方面，还要在組織好本地区的“比学赶帮”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有计划、有领导地組織各省工业领导机关和一些企业，派人到全国各兄弟地区去学习好經驗、好作风、好方法。我們坚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只要高举毛澤东思想紅旗，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比学赶帮”运动同有领导地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活动結合起来，工业战线上的增产节约运动，一定能够掀起一个新的高潮。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提高。





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情况

何祚庥在《红旗》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的《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谈到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两年来，《学术研究》、《新建设》等报刊，分别发表了杜雷、吴俊光、陶德麟等同志的文章，他们就讨论中的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何祚庥又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号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现将他们的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在讨论中，着重探讨了这个问题：**科学理论经实践检验为正确以后，还要不要修改？**

何祚庥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科学理论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而在以后又要加以修改的这种事实，

也就是实践标准的这种相对性——完全是历史上合乎规律的现象。”他又说：“即便是那些由于预言过新现象并得到实验证实的理论，也仍然可能由新的实践表明它们有一些不灵的‘预言’。”<sup>①</sup>何祚庥以马克斯威尔电动力学

方程为例，来论证自己的看法。何祚庥说，马克斯威尔电动力学方程的正确性，是由于它对“位移电流”、“电磁波”等现象做了一系列的预言并经实验加以验证后，从而证明方程式的正确。可是当人们把马克斯威尔方程应用到电子绕原子核的运动时，那末马克斯威尔方程将“预言”电子会不断辐射能量，而最后就要堕入原子核中。何祚庥说，“实践却表明这种‘预言’是完全不正确的”。

何祚庥认为，实践验证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由个别来检验一般，由有限推出无限。他说，实践是个别的、具体的、有限的，理论是一般的、普遍的、无限的，“而个别和一般、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之解决，却决不是一两次的实践就能穷尽的。因而对于那些普遍理论来说，即使它们已有实践检验为正确，但是在理论的概括中，总是免不了‘内插’或‘外推’，或者说，总是有一个把有限转无限的过程。既然有了‘内插’和‘外推’，那末新的实践就有可能表明这种‘内插’和‘外推’是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也就产生所谓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了”。

杜雷和吴俊光认为，何祚庥关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论述，给人这样的印象：在实践的基础上，并经实践验证的自然科学理论，似乎仍然不甚可靠。“如果离开实践标准的可靠性来谈它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实质上就会否认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标准”<sup>②</sup>。

① 《不能离开历史观点理解实践标准》。见《新建设》1962年11月号，以下所介绍的何祚庥的意见，凡没有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② 《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运用》。见《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所介绍的杜雷和吴俊光的意见，凡没有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他們认为，何祚庥的錯誤在于把限定在一定条件下經由实践檢证过的部分和另一条件下未經实践檢证过的部分混为一談。例如，对于馬克斯威尔电动力学方程預言的正确和不正确，何祚庥也是把在一定条件下曾被实践檢证为正确和在另一条件下未經实践檢证为正确混为一談。

杜雷、吳俊光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提出这样的看法：“一切有限的实践都只能引起有限自然界的變化，获得有限自然界的認識。它只能在它的作用範圍內認識科学理論。验证科学理論，在这个範圍內，它是完全可靠的标准，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绝对的；同时，正因它只能在这个範圍內才适用，所以，它又是相对的，在这个範圍以外使用它，就会得出錯誤的結果。”

何祚庥在反駁文章中，不同意杜雷和吳俊光的这个看法，认为他們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論述，是以使用範圍来立論的，是抽去了“真理界限的可變易性”这一面，“他們不是历史地具体地来看待所謂实践檢证的作用範圍”。

陶德麟认为，关于实践到底能不能确切地证明某一認識是真理或錯誤的問題，何祚庥的說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承认实践是能够确切地证明某一理論是正确或錯誤，另一方面又說科学理論經实践檢证为正确后还要修改（陶德麟认为，何祚庥这里所說的“修改”，并不是通常所說的发展、深化等，而是指部分地推翻）。<sup>①</sup>陶德麟认为，何祚庥产生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是：沒有把真理的客观內容同真理的适用範圍（或界限）这样两个問題区别清楚，因此，就不能正确地說明实践能

够确切地证明的是什么，不能确切地证明的是什么。陶德麟說，一种認識是不是具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客观內容，是不是同一定的客观对象相符合，实践是能够确切地证明的。这是实践标准的确定性、绝对性的表现。另一方面，科学理論中确实还有不能为实践所确切地证明的东西，那就是关于真理的适用範圍問題。这是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相对性的一面。陶德麟认为，何祚庥的观点“是一种导致混淆真理和錯誤的界限的相对主义观点”，“实际上抹煞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在关于实践标准問題的討論中，还联系到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应如何区分的問題。

何祚庥认为，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是認識上的两个环节，应当按照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或完善程度来划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sup>②</sup>绝对真理是全面而又完善的認識，它不会为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他說：“在一定条件下，由于人們的实践已达到高度的水平，而我們所研究的事物又是足够地簡單的話，那末或許可以认为对于某些問題的認識，已經是绝对真理”。例如，质量和能量的守恒定律，也許多多少少可以作为这种終极的真理的例子。何祚庥认为，相对真理也是基本上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知識，但这只是不完整的、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的知識。这种知識将在科学往后的发展中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并日益深化、精确和具体。何祚庥认为，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① 《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几个問題》。見《新建設》1963年10月号，以下所介紹的陶德麟的意見，均引自此文。

② 《論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見1963年8月6日《文汇报》。



归結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不是十分确切的。“这便意味着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只是在范围上有所扩张”,“相对真理中不够完善、不够精确的部分也将进入绝对真理了”<sup>①</sup>。何祚庠也不同意“相对真理的全部都是绝对真理”这种看法,认为是“脱离了历史观点,而把真理看作是某种不变化、不发展的东西”<sup>②</sup>。

杜雷、吴俊光和陶德麟都不同意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看作两种不同的真理。他们认为,任何真理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

杜雷和吴俊光认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都是同一个客观真理,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从不同的意义来考察。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总是具体的,总是从局部的有限的世界开始,每个局部世界的认识对全部客观世界的认识而言,是相对的。而且,对于局部世界的正确反映,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从这些意义上看,每个客观真理是相对真理。但是,具体事物具有绝对物的本性,局部世界与全部世界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相对真理同时又是绝对真理,两者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sup>③</sup>

陶德麟认为,任何真理,总是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中某一具体过程的正确反映。这个具体过程本身是相对的,因而人们对于这个过程的认识也是相对的。而且,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总不能把这个过程的一切都穷尽地反映出来,因而即使仅就人们对于某一个具体过程的认识来说,也是没有穷尽的,任何时候的认识也只是相对正确的。从这个意义来看,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真理。但是,作为真理的内容的某一个相对的具体过程,又是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的一个部分,又具有绝对物的本性。而且,就已经正确

地反映了的那些方面来说,认识同对象的符合也是绝对的。从这个意义来看,任何真理又都是绝对的,都是绝对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杜雷、吴俊光和陶德麟都不同意用全面不全面、完善不完善作为标准来划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陶德麟说,所谓全面和完善本身是相对的。任何真理,从它是客观对象的正确反映这一点来说,都是全面和完善的;从它还没有穷尽客观对象的一切,还需要深化和发展这一点来说,又都是不甚全面和不甚完善的。

杜雷和吴俊光认为,以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来划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必然陷入相对主义。他们说,有人认为发现原子内部存在电子,这就是绝对真理。但是,随着原子科学的发展,在原子核中还不断发现新的粒子。显然,电子的发现,又比较得很不精确了,那末还是不是绝对真理?这样,人们也就不可能获得绝对真理的认识。他们认为,何祚庠的错误在于“把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和反映客观世界的正确与否混为一谈”。

在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所涉及的有些问题,同两、三年来学术界讨论真理同错误的关系问题是有联系的。一九六二年以来,《文汇报》、《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报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讨论了相对真理是否包含错误等问题。讨论情况可参见《新建设》一九六二年九月号和《哲学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三期的综合报道。(展 麟)

①② 《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见1963年8月6日《文汇报》。

③ 《正确运用历史观点探讨真理的问题》。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客观标准

——与何祚庥同志商榷

杜 雷 吳俊光

关于什么是相对真理,什么是绝对真理,何祚庥同志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认识上两个不同的环节,应当“按照反映客观现实的完备程度或精确程度来区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他认为,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正确地阐明“真理是一个过程,它要随着历史条件而不断发展”;同时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正确地阐明“这种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真理,仍然是客观事物在主观认识上的正确反映而不是歪曲的反映”<sup>①</sup>。

我们认为,这个论点是不正确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不能以认识的精确程度或完备程度来区分的。人的一切认识都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认识的精确程度或完备程度是没有终结的。在我们看来,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它经由实践检验是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就是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都是指这种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认识。由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总是从每个具体事物(即局部的有限的客观世界)及其各别的发展阶段开始,这种认识过程一个接一个地无限继续,便日益接近(不是穷尽)对全部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认识。每个局部的有限的客观世界对于全部的无限的客观世界而言,是相对的。关于每个局部的有限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全部无

限客观世界的认识来说,也是相对的,它将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就这一点看,正确的认识就是相对真理。同时,这种正确的认识是和绝对存在的客观世界相符合的,就这一点看,它又是绝对真理。承认认识的绝对真理性,不在于它反映客观现实的完备程度或精确程度,只在于它和绝对存在的客观世界相符合,它不会被推翻或修改,因此,它又是永恒的真理。但它仍要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不是终极的真理。

关于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问题的争论,问题在于对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理解存在着分歧。何祚庥同志认为,由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也可能由“新的实践”证明它是不完全正确的,而要加以修改。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这篇文章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实践在检验真理方面,究竟起什么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作了深刻的阐明。他说:“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

<sup>①</sup> 《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1963年8月6日《文汇报》。



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sup>①</sup>这就是说，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唯一的标准只能是实践。

那末，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正确的认识，是否还有和客观实际不符合的部分呢？

何祚庥同志认为：“拿已有充分科学根据的理论来说，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理论只是相对正确的。”“对于那些已有大量科学实践证明它为正确的理论，我们仍应持批判的态度。”<sup>②</sup>又说：“由此可见，科学理论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而在以后又要加以修改的这种事实，也就是实践标准的这种相对性——完全是历史上合乎规律的现象。”<sup>③</sup>在他看来，由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认识，还包含有不符客观实际的、将被修改的成分。

事实并不如何祚庥同志所说的那样。科学史证明，一种理论之所以被推翻或修改，不在于实践标准具有相对性，而是因为这种理论没有真正为实践所证明，或未完全被证明。何祚庥同志在考察真理问题时，忽视了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那个理论创立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

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sup>④</sup>如果认为经过实践甚至大量实践检验并证明它为正确的理论，在以后又要加以修改，是历史上合乎规律的现象，那就谈不上通过实践，可以纠正理论的不完全性和错误，谈不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但是人们的理性认识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还要再回到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才能判明。在检验中，它的真理性不完全的，由实践纠正其不完全性；错误的，由实践纠正其错误。

但是，怎样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呢？

何祚庥同志说：“从逻辑上说，由实践来纠正理论上的错误，是比较容易符合逻辑上完备性的条件的。由三段论知识告诉我们，要推翻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题，只要有一个特殊的例外就行了。但是要由实践来证明一个普遍命题，却要复杂一些。因为一切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而理论却总是某种一般性、普遍性的无限的东西。”<sup>⑤</sup>

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客观标准，这是人类认识史告诉我们的，也是科学发展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理解的实践，经过实践

①④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1、281—282页。

② 《论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问题》。《红旗》1962年第2期，第23页。

③⑤ 《不能离开历史观点理解实践标准》。《新建设》1962年11月号，第40、39页。



檢驗認識是否正確，是否符合于客觀實際，這同形式邏輯的三段論式，同完全歸納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形式邏輯不能證明科學理論，相反，形式邏輯的前提是否正確，需要由科學來證明。其實，所謂“理論却總是某種一般性、普遍性的無限的東西”，這表明認識是處于理性認識階段，而不是實踐檢驗認識的過程。理論的真理性，還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因此，必須由實踐來檢驗其中哪些是真理，哪些是錯誤。至于“要由實踐來證明一個普遍命題，却要複雜一些”，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討論的是實踐能不能確切地證明認識的真理性問題，而不是實踐檢驗認識複雜不複雜的問題。理論概括中包含有不符客觀實際的部分，是由于這些部分未經實踐檢驗，而不是由于實踐標準的相對性。

何祚庥同志還說：“問題在于在實踐檢證科學理論過程中，其基本內容是由個別來檢驗一般，由有限推出無限。而個別和一般、有限和無限之間的矛盾的解決，却決不是一兩次的實踐就能窮盡的。因而對於那些普遍理論來說，即使它們已有實踐檢證為正確，但是在理論的概括中，總是免不了‘內插’或‘外推’，或者說，總是有一個把有限轉無限的過程。既然有了‘內插’和‘外推’，那末，新的實踐就有可能表明這種‘內插’和‘外推’是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的。”<sup>①</sup> 這段話令人費解。這裡說的由個別檢驗一般，由有限推出無限，顯然是理性認識的問題，不是實踐檢證的基本內容。而認識達到理性階段，只完成認識過程的一半，如毛澤東同志說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sup>②</sup> 理性認識還須再回到實

踐去檢驗。既經實踐檢驗為正確，對於有限客觀世界的一次認識過程就算完成了。如果說還有什麼理論概括中的“內插”或“外推”，那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進一步的新的認識過程的理性認識階段。其中的“內插”或“外推”，當然仍將再回到新的實踐中去檢驗，證明哪些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哪些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大家知道，要求實踐檢驗窮盡理論概括的一切，是不應該的，也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實踐能檢驗多少就算多少；那些當時不能檢驗的認識，終將由往後的實踐來檢驗，確證它是真理還是錯誤。因此，絕不能把未曾檢驗的認識當作已經檢驗的；也不能把當時人們錯誤地認為檢驗過的認識當作已為實踐證明的真理。何祚庥同志所謂“新的實踐就有可能表明這種‘內插’和‘外推’是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的”，只不過是新的實踐證明這些認識並未真正被檢驗過罷了。所以，這個論斷是不能成立的。何祚庥同志的錯誤，在于把尚未檢驗過的理性認識當作已由實踐檢驗證實的真理，因而得出在被檢證過的認識中，還有不完全符合客觀實際的“內插”和“外推”的結論。

在我們看來，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和絕對性是實踐標準的兩個方面，它們和真理的相對性與絕對性具有同等的意義。對於全部的無限發展的客觀世界、絕對自然界的認識，只能實現于有限認識的無限繼續中。或者說，對於無限的客觀世界、絕對自然界的認識，只能依賴于有限實踐的無限繼續。一切有限的實踐都只能引起有限自然界的變化，

<sup>①</sup> 《新建設》1962年11月號，第41頁。

<sup>②</sup> 《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0頁。



使人們獲得對有限自然界的認識。因而，人們只能在實踐的作用範圍內認識客觀事物，驗證科學理論。在這個範圍內，實踐是完全可靠的標準，就這個意義而言，實踐標準是絕對的；同時，正因為它只能在它作用的範圍內才適用，超出這個範圍以外使用它，就會得出錯誤的結果，而隨着實踐的無限延續，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也就不斷發展（這個過程是無窮盡的），所以，實踐標準又是相對的。

何祚麻同志在論述實踐作用的範圍及其使用的範圍時，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所謂使用範圍是怎樣確定的？”<sup>①</sup>這確是個需要回答的問題。能否這樣說：人們可以在實踐作用範圍之外來檢驗人們認識的真理性？能否這樣說：由於這種超出實踐作用範圍以外檢驗認識，得出錯誤的結果，就可以肯定為實踐確證的真理（相對真理）包含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東西呢？不，我們認為不能這樣說。這裡的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東西，實際上是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認識，被人們錯誤地認為已由實踐檢驗過了。這種認識之所以不符合客觀實際，或包含錯誤，是不足為奇的。至於這個範圍怎樣確定呢？當然還是由實踐確定，或由進一步的實踐確定的。何祚麻同志說：“因為隨着實踐水平的提高，人們的認識也就不斷發生變化。而在早先人們曾經認為實踐已做了確切證明的理論，就可能在新的條件下來修正原有的結論，更精確地確定它的界限。”<sup>②</sup>我們認為，這種修正，並不是由於實踐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人們認識的不斷變化發展，而是因為它被錯誤地認為已由實踐確切證明的理論。問題還不止於此。何

祚麻同志接着說：“正因為這樣，所以必須對歷史上一切自然科學理論（包括已有一定的實踐證明為正確的那些理論）持批判的態度。”<sup>③</sup>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依我們看來，對於已有一定的實踐證明為正確的那些理論，如果還必須持批判的態度，那就意味着不再有任何足以表明客觀世界的可知性和作為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的東西，這在實質上就否定了實踐標準。

關於實踐標準問題，列寧說過：“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列寧接着又說：“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sup>④</sup>這就告訴我們，經過實踐檢驗的正確的認識，是不應當懷疑的。但是，也不能把已由實踐檢驗為正確的那些理論，當做僵化的、凝固的教條。何祚麻同志肯定每一歷史階段上的實踐總不免有局限性，因而它不能完全證實或駁倒所有的認識；也肯定今天實踐還不能證明的認識，在明天和後天的實踐中終將得到證明。我們完全同意這種見解。但是，何祚麻同志卻認為，那些已由實踐檢驗為正確的認識只包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這就意味着還包含有不符合客觀實際的成分。這樣一來，就不是實踐不能完全證實或駁倒所有的認識，而是連一個認識也不能完全證實或駁倒了。這種看法，我們不能同意。

<sup>①②③</sup> 《新建設》1962年11月號，第39、40、42頁。

<sup>④</sup>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2—143頁。



实际上，所谓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是对同一个实践而言，这里并不存在两个不同的实践。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有限的，有限对无限而言是相对的。它只确证有限世界的认识，因此，实践标准具有相对性。同时，经它确证的任何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无限的东西的正确认识，因此，这种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在本质上是绝对的。对于这种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界限，何祚麻同志认为未免成为“空中楼阁”。如果按照何祚麻同志的这种看法，那就只有把同一个正确的认识看成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包含将被推翻或修改部分的“真理”；另一个是不包含这些部分的真理。同样的，也只有把同一个实践标准看成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检验相对真理的标准，只具有相对性；另一个检验绝对真理的标准，只具有绝对性。果真如此，那恰恰是以非历史观点理解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我们认为，凡经实践检验为正确的认识，都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不会有错误成分。人们通过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意义，就是指用实践来检验理论概括中，哪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些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那些已被证明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不会再为“新的实践”所推翻，不存在“内插”和“外推”而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

科学每前进一步，都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供新的证明。

恩格斯曾举显而易见的科学事例来说明实践检验真理的作用。他说：“氯和氢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之下受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合成气体氯化氢；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我

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了上述的条件，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这件事情，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千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sup>①</sup> 恩格斯在论归纳和分析时也說：“在热力学中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证明归纳法之妄图作科学发现的唯一的或甚至占统治地位的形态的想法是如何地没有根据。从热当中能够得出机械运动，这点已由蒸汽机提供了最令人信服证明。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更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sup>②</sup>

恩格斯举出的这两个科学例证，证明实践能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现在科学已发展到原子能时代，但对于氯和氢在一定条件下就会爆炸而合成气体氯化氢和一部蒸汽机证明从热当中能够得出机械运动的理论的正确性，依然是完全可靠的。如果像何祚麻同志那样要求实践穷尽个别和一般、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那么，不仅一二次实践，就是亿万次实践，也不可能穷尽的。

何祚麻同志认为，经由实践甚至大量实践充分证明为正确的理论，还会为新的实践表明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要加以修改。为了证明上述论点，何祚麻同志举出了牛顿力学、宇称守恒定律等科学史上的事例来说明。但从他自己的分析中，却不能证明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就牛顿力学来说，当人们能处理那些速度接近于光速的粒子以后，牛顿力学就发展成为相对论；但是，在物体运动速度缓慢的情况下，为大量科学实践确证的牛顿力学仍

<sup>①②</sup>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5、190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然是永恆的、不被推翻的真理。新的實踐只是表明，牛頓力學未曾在高速運動的情況下被檢驗過。

就宇稱守恆定律來說，新的實踐證明，弱相互作用過程內宇稱是不守恆的；但是，在電磁相互作用過程內，曾經由大量實踐證明的宇稱守恆定律並未被推翻或修改。

同樣地，在“位移電流”、“電磁波”等等現象下，曾經由實踐確證為正確的馬克斯威爾電動力學方程，並不因新的實踐證明它應

用到電子繞原子核運動時的“預言”完全不正確而被推翻。

由此可見，何祚麻同志用來論證自己論點的一些事例，恰好證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和可靠的客觀標準。相反地，證明何祚麻同志所謂“科學理論經由實踐檢驗並證明它為正確，而在以後又要加以修改的這種事實，也就是實踐標準的這種相對性——完全是歷史上合乎規律的現象”的論斷，是完全不符合於客觀實際的。

## 再談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實踐標準問題

——答杜雷、吳俊光、陶德麟等同志

何 祚 麻

實踐標準在自然科學研究中如何體現和具體運用，是科學研究方法上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因為這牽涉到自然科學研究中科學的真理是怎樣形成和建立的。我曾在《論自然科學研究中有關實踐標準的若干問題》、《不能離開歷史觀點理解實踐標準》等文<sup>①</sup>中，對於這個問題進行了初步的討論。不久，看到杜雷、吳俊光以及陶德麟等同志提出不少商榷性的意見。<sup>②</sup>現在，就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和絕對性這兩個問題，再談談我的意見。

### 一 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

馬克思主義真理論曾經着重討論了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客觀真理是否存在，它可以

被人們認識，還是不能被人們認識。第二，人們如何認識客觀真理，它是一下就被人們完全認識，還是逐步地被人們認識。對於第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作了肯定的答復，認為客觀真理是存在的，並且是可以被人們認識的。對於第二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指出，人們對於客觀真理的認識是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人有絕對的和無限的認識客觀世

<sup>①</sup> 見《紅旗》1962年第2期；《新建設》1962年11月號。

<sup>②</sup> 杜雷、吳俊光：《關於實踐標準的理解和運用》，《學術研究》1962年第4期；《正確運用歷史觀點探討真理的問題》，《學術研究》1963年第3期。陶德麟：《關於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幾個問題》，《新建設》1963年10月號。本文在下面引用他們的意見，只注期刊和頁數。



界的能力，能全面而完善地認識客观真理；但是对于具体的个别的人來說，在認識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只能在一定近似程度上認識客观世界的某一些片段、某些方面和某些范围。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們所認識到的这些片段、方面、范围，便不断地扩展，逐渐全面而又完善地認識客观事物。恩格斯在論述黑格尔的哲学时指出：“真理包含在認識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sup>①</sup>。列宁也指出，“真理是过程。”<sup>②</sup> 牛頓力学曾經有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力学上的永恒真理，而到了現代，牛頓力学已发展为狭义相对論和量子力学。可是狭义相对論和量子力学也不是什么永恒真理，狭义相对論已进一步发展为广义相对論，量子力学已进一步发展为相对性量子力学或量子場論。馬克思主义也是在不断发展着的。毛澤东同志說：“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認識真理的道路。”<sup>③</sup> 由此可見，真理确实是不不断变化、发展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馬克思主义認識論中引进了相对真理和絕對真理的概念。絕對真理是全面而又完善的真理，它不会被后来的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相对真理是正在发展、变化中的真理，它也是正确反映客观实际的真理，但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在一定界限內、一定条件下反映客观现实的真理，它要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改、补充并日益精确、完善。相对真理和絕對真理是人們認識客观真理的两个环节。在認識发展的某一阶段上，人們对于客观事物的認識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可是在这种相对的

真理性中，总包含有絕對真理的顆粒，而全部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构成了絕對真理。

可是，在杜雷、吳俊光以及陶德麟等同志的文章中，对于相对真理和絕對真理的概念以及它們的辯证发展关系，却做了另一番理解。杜雷和吳俊光同志认为，不应就“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作为“相对真理和絕對真理区分的标准”，如果作了这种区分，就意味着“相对真理可以允許包含部分錯誤的东西”，便会由于自然科学理論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而永远达不到絕對真理，“結果必然陷入相对主义”<sup>④</sup>。杜雷和吳俊光同志还进一步断言，“相对真理的全部都是絕對真理”，“一切真理既是相对的，同时又是絕對的”<sup>⑤</sup>。陶德麟同志也不贊成用全面和完善与否作为划分相对真理和絕對真理的标准，认为“用全面不全面、完善不完善作为标准来划分絕對真理和相对真理，实际上也是分不清楚的。原因在于：所謂全面和完善本身就是相对的。”<sup>⑥</sup> 同时他也认为相对真理和絕對真理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真理，任何真理既是相对真理，同时又是絕對真理。

这里有两个問題。第一，这就取消了相对真理和絕對真理在质上的区别，因而就没有什么必要在馬克思主义真理論中引进相对真理和絕對真理的概念。第二，更重要的是，

① 《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頁。

② 《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5頁。

③ 《實踐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4頁。

④⑤ 《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第12、15、11頁。

⑥ 《新建設》1963年10月号，第93頁。



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真理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概念，然而这完全不符合于科学史发展的事实。

恩格斯曾指出：“关于事物的知識，在其本质上对于漫长系列的世代來說都是相对的，只是逐步的趋于完善，或者如宇宙論、地质学和人类历史，由于历史材料的不足，甚至永远总是不完整的、沒有完成的。”<sup>①</sup> 列宁也說：“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确”<sup>②</sup>。由此可见，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是从反映客观实际的完善、精确与否来闡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概念的。他們从来没有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看作是同一种真理，而是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当作是認識上的两个环节，认为人們对于客观真理的認識是通过相对真理而逐渐地接近于绝对真理的。列宁指出：“我們的知識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历史条件制約的，但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們向它的接近也是无条件的。”<sup>③</sup>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說：“人类的时空观念是相对的，但绝对真理是由这些相对的观念构成的；这些相对的观念在发展中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sup>④</sup>

可是，如果像杜雷等同志所宣称的“相对真理的全部都是绝对真理”的話，那末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概念上，就完全没有真理的精确、完善与否的区别，在人的認識活动中也就沒有这种由相对真理不断地接近于绝对真理的发展、变化了，于是这就在馬克思主义真理論中抽去了历史发展的观点。

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可是，并不像陶德麟等同志所理解的那样，认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仅仅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或相对真理就是绝对真理。列宁曾指出，“每一个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sup>⑤</sup>。显然，所謂相对真理中的全部都是绝对真理，同列宁所說的相对真理中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是完全不相同的意思。由相对真理来构成绝对真理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上的积累，它同时也是内容上一系列的飞跃、发展的过程。这种变化、发展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它将愈来愈精确而完善地反映着客观现实；第二，它将有愈来愈宽广的适用范围，并且它所适用的界限也将愈来愈制定得具体、确切。但是，在相对真理的发展过程中，除了看到它在适用界限和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上变化、发展的一面以外，还要看到在真理发展过程中吸收和继承的一面。新的理論比起旧的理論在内容上虽然是大大扩展了，但是新的理論却总是概括着旧的理論作为它的一个特殊情况。例如，相对論就一方面比牛頓力学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而另一方面又概括着牛頓力学作为它的特殊情形，而当物体的运动速度較慢时，相对論就自动地还原为牛頓力学。

可是，承认牛頓力学可以作为客观真理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頁。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②③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26頁。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③④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5、179頁。



而保留下来，是不是就像陶德麟同志所宣称的那样，这“就等于承认它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sup>①</sup>呢？我感到并不是这样。这是因为：第一，牛顿力学并不是简单地被吸收到相对论的理论中来，由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还有一个批判和改造的过程，牛顿力学主张所谓“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而在相对论中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论就较牛顿力学中时间、空间的理论更为精确地符合于客观实际。第二，即便在物体运动速度较为缓慢的条件下，所谓相对论可以归结为牛顿力学，只不过是说牛顿力学的算式是相对论算式的第一级近似，但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微小差异仍然可能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实际上，为相对论奠定基础的一个极重要的实验，——迈克逊、摩雷测量地球对于“以太”相对运动的实验，就是测量相对论和牛顿力学之间的这种微小差别的。

由此可见，所谓相对真理的发展、变化，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数量上扩展的过程。

杜雷和吴俊光同志认为，如果以“反映客观实际的精确程度”来“作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区分的标准”，就意味着“似乎相对真理可以允许包含部分错误的东西”<sup>②</sup>。我感到这是把认识中的错误和真理中的不完善性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真理和错误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正确的东西决不能说是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东西也决不能说是正确的东西。把真理说成是错误，或者把错误说成是真理，就叫做混淆了真理和错误、是和非之间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不赞成相对真理可以包含有部分错误的意见的。因为不可知论或相对主义的一个根本思

想，就是从真理的发展性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有真理和错误之间的对立。承认相对真理可以包含有部分错误或个别错误，就意味着在这种“部分”或“个别”上对于相对主义或不可知论作了让步。

可是，承认真理和错误之间的绝对的对立，却并不意味着要否认真理有不十分全面、完善和较为全面、完善的差别。人们对于某一客观事物的认识还不够完善，并不等于说这就是错误的认识或认识上包含有错误。某一自然科学理论在定量关系上还不够精确，并不等于说这个理论有错误的部分。一个平面镜中的映象并不就是原来的物体，但是它和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镜中的映象仍有原则上的区别；由齐白石寥寥数笔所构成的画面，和现代派、未来派的“杰作”也不能不是原则上的区别。前者是客观事物的近似正确的反映，而后者却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了。在人们认识客观真理的过程中，固然不是剔除相对真理中的错误部分而逐渐接近于绝对真理，但是确实要不断修改相对真理的认识中不甚精确、不甚完善的部分，而如果没有这种“修改”，就没有真理的变化、发展的过程。

对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概念做了如上的理解，也不会像杜雷等同志所说的那样，要导致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结果必然陷入相对主义”。

列宁曾指出，“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

① 《新建设》1963年10月号，第93页。

② 《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第12页。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辯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說,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約的意义上,承认我們一切知識的相对性。”①

为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承认“一切知識的相对性”,而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承认不致于导致“否定客观真理”呢?这是因为:

第一,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間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对真理是绝对真理的发展前提,绝对真理是相对真理发展的“极限”。在認識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人的認識虽然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但是就認識发展的趋向來說,它却要一天天趋于完善、精确。正是由于人的認識具有这种日趋完善、精确的性质,因而这种十分完善、十分精确的绝对真理就作为发展的“极限”而存在着,这正如数学上无限发展的貫数,它要收斂于某一极限值一样。

第二,绝对真理并不脱离相对真理而存在着,在相对真理中間总是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人們对于客观事物的知識,虽然在不断发展、变化,但在这种发展、变化的真理当中,却蕴含着不变的东西。在相对真理中哪一部分是绝对真理,已由实践檢证过的相对真理所适用的范围有多大,这都不是一下就能弄清楚的。但是,对于相对真理來說,只要它为实践所檢驗并证明它为正确,那末其中,就总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这种绝对真理的成分就要作为宝贵的财产而继承下来。自然科学的进

一步发展,将能为我們指明哪些是完善的真理,哪些是不完善的真理。

第三,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人們的实践已达到高度的水平,而我們所研究的事物又是足够地简单的話,那末或許可以认为对于某些問題的認識,已經是绝对真理。按照恩格斯的意見,对于那些“多多少少可用数学方法处理的那种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于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偉大的字句的話,那么也可以說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的真理,是終极的最后的真理,也因为如此,这些科学被名为精密科学”。不过,在自然科学研究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远非所有成果都有这样的性质”②。

由此可見,承认我們所認識的一切知識的相对性,是并不意味着排斥了绝对真理的,而是否承认有这种十分完善、全面的绝对真理的存在,正是馬克思主义真理論同不可知論、相对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可是杜雷、吳俊光、陶德麟等同志却认为:到今天为止,人們还没有任何一次認識过程,不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倘以所謂完备程度来区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就没有什么知識可以看作是绝对真理。如果认为一切知識只能是相对真理,这样,实质上就是根本不承认認識绝对真理的可能,而这就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不可知論或相对主义的錯誤。而如何避免这种相对主义的錯誤呢?按照他們的看法,这只有承认“相对真理的全部都是绝对真理”。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 14 卷,第 136 頁。

② 《反杜林論》,第 89 頁。



对的真理”。其实，相对主义者或不可知主义者的错误，并不在于承认一切知识的相对性，而在于他们把认识的相对性和认识的绝对性看作是绝对不相容的东西，因而他们便从真理的变化和发展当中做出客观事物不可认识的结论。可是，简单地宣称相对真理就是绝对真理，这并不能真正驳倒相对主义。这是因为：第一，虽然杜雷等同志可以宣称人们所认识的一切相对真理都已经是“绝对”真理，但这种“绝对”真理并不因此就不随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变化，相对主义者就仍然可以从这种“绝对”的真理中做出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质的结论。第二，如果认为这种正在发展、变化中的相对真理已经是绝对真理，那末，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就要否认有那种十分全面、完善的永恒的绝对真理。

从我们看来，那种十分全面、完善的绝对真理虽然是不能达到的，却是可以不断地接近的，从人们认识的不断地趋于完善、趋于全面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这种十分全面、完善的真理是存在的。而是否承认这种绝对真理的存在，正是区分马克思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极重要的界限。而按照杜雷、吴俊光、陶德麟等同志的理解，那末我们所能得到的只能是在形式上很明确但在内容上却是很模糊的一条界限。这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两种不同理解的后面所隐藏着一个极重要的差别。

## 二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杜雷和吴俊光等同志之所以对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作了不同的理解，是同他们不

具体地分析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分不开的。由实践来检验真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就人们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可以对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和错误做出确切的判断；但是如果只就某一历史阶段上进行过的某一些实验或某些局部性质的实践来说，那末这就不一定。它们有时可以做出确切的判断，有时就不见得能做出确切的判断。而且，即使那些科学真理经过实践检验以后，仍然可能由于实践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还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可是，从杜雷和吴俊光等同志看来，持有这种观点就要取消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他们写道：“何祚庥同志关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论述，有些地方却给人这样的印象：在实践的基础上，并经实践验证的自然科学理论，似乎仍然不甚可靠。……他认为实践标准所以有绝对性的一面，只是因为凡经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对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作出这样的规定，仍是不充分的。因为根据他的看法，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一部分绝对真理成分不会消失，但是，同样为实践验证过的相对真理的另一部分，当然就会消失了。这样说来，实践验证过的客观真理，似乎只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是正确的，另一部分或小部分是不正确的。请问：已由实践验证过的客观真理，又用什么标准来验证其中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不正确的呢？如果当时的实践水平还未能验证其中不正确部分，那末，这正说明那些不正确部分是当时的实践水平未曾验证过的。这就不能把它说成是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了。按照何祚庥同志关于实践标准



的相对性的論述，实践似乎还不是衡量真理的唯一客观标准。”<sup>①</sup>

对于这个问题，陶德麟同志也作了类似的阐述：“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客观真理当中只有一部分不会消失，而另一些部分却会消失！试问：这些会消失的部分是什么呢？是真理呢，还是错误呢？如果是真理，那就是说真理也会消失了，被实践证明了是真理的东西又会重新被证明为不是真理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就没有了。如果是错误，那就是说经过实践检验过并证明了是客观真理的东西当中竟然有一部分并不是客观真理，实践标准的绝对性也还是没有。按照这种说法，怎么能使人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可靠标准呢？怎么能使人相信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呢？”<sup>②</sup>

我感到这些意见是不正确的。从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把认识上的错误（这是对于客观事物的歪曲的反映）和认识上不够完善、不够全面（这是对于客观事物正确的但近似的反映）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因而在他们看来，就只有正确和错误与否的问题，而没有真理是否完善、全面的问题。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因而也就不能辩证地理解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为了弄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人的认识活动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人们在感性直观里所把握的是一些个别的有限的知识，可是在理性思维中却要求我们把

个别的、有限的感性材料提升为某种一般的、无限的东西。因此，认识活动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个别和一般、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而所谓认识，便是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解决这个矛盾。认识上的这个矛盾除了表现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一飞跃外，而且也表现在由理论到实践这一飞跃。人们在应用理论于实践、由实践来检验理论时，还将进一步解决个别和一般、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

实践检验科学理论的基本原则，是把理论应用于实践，看它是否能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样，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从逻辑上说，由实践来纠正理论上的错误，是比较容易符合逻辑上完备性的条件的。三段论知识告诉我们，要推翻一个全称肯定的命题，只要有一个特殊的例外就行了。但是，要由实践来证明一个普遍命题，却要复杂一些。因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而理论却总是某种一般性、普遍性、无限的东西。在实践检验理论过程中，人们总是拿实践所给出的实际结果和由一般理论所抽取出来的具体结论进行对比，以便从中做出科学理论是否正确的论断。试问：人们为什么能从一个个的事例中作出一般的理论的结论来呢？

在一些较特殊的情况下，如果人们掌握的感性材料已是十分丰富，而实践又表明它能满足完全归纳法所需要的条件，那末在这

<sup>①</sup> 《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第14页。

<sup>②</sup> 《新建设》1963年10月号，第100页。



种情况下实践证明了科学理论是正确的。可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完全归纳法的条件常常是很难满足的，于是人们就求诸一些典型的事例。这些事例都是单个的具体事例，但它又是某一类、某一属的典型，因而在这种个别现象或事例中已经体现着一般。假如实践表明理论在这个典型事件中是正确的，那末便由此类推理论在这一类、这一属中都是正确的。实验验证理论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人们常常从理论的认识出发，纯逻辑地预测若干前所未知的新现象，然后再由实验来加以验证。应该说，在这类新现象的预测中，本身就是一般理论的产物。如果实践证明这种预测是正确的，就可以认为实践证明理论是正确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实践检验理论的过程中，它体现着一般和个别的统一。实践虽然是具体的、特殊的，但这种个别和特殊已经不是感性认识阶段上那种个别、特殊，而是和一般理论密切结合的这种个别、特殊。换句话说，在实践检验真理过程中，人们将个别、特殊和一般统一起来了，这意味着认识已经到了更高的阶段。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经深刻地叙述道：“单凭经验性的观察决不能充分地证明必然性。……这种说法之正确程度，正如不能由太阳在早晨升起而推论明天也会再升起，并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会有太阳在早晨不升起的一天。但必然性的证明是在于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某一‘在这以后’，那末它便和‘由于这’等同了。”<sup>①</sup>由此可见，由实验来验证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它总是要设法造成某一

个“在这以后”，以便从而做出“由于这”的结论出来。

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就要求我们历史地具体地来对待一切现象，也要求我们历史地具体地来对待实践标准。人们的实践水平是不断提高的。随着实践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认识也就要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在早先人们曾经认为实践已经做了确切证明的理论，就要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相应的修改。这种修改将表现在下列两方面，它将使理论能更准确地反映着客观实际，或者更准确地规定它适用的界限。

譬如说，在过去的科学水平上，实践曾经证实理论的概括是满足“完全归纳法”的条件的，而现在却可能由新的实践表明所谓满足完全归纳法的条件原来它并不能满足。例如，在历史上曾经基于化学元素在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中不能相互转化的事实，特别是从“点金术”的失败当中而做出元素不能相互转化的概括。在当时的条件下，就己知的元素来说，都没有发现它们有相互转化的事实，因而就基于这种事实而归纳出所有化学元素不能相互转化的判断。可是随着人们发现原子核的放射性现象和原子核反应以后，表明有一些元素能自动地衰变为别的元素，或者在某些外界条件影响下而转化为别的元素。这样，新的实践就表明这种完全归纳法实际上是并不完全的，因而也就要修正这个普遍的结论，而把它局限在一定的条件下。

又如，在过去的科学水平上，人们曾经

<sup>①</sup>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91页。





基于若干典型的事例而做出若干概括，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却发现过去所根据的典型的实验资料，原来却并不那么典型。这样，根据过去的经验所做出概括的范围就可能变化。牛顿力学的修正就是一个例子。在过去，人们曾经基于大量实验资料而作出牛顿力学是适用于一切物体的力学这个概括。可是随着实验的发展，却发现用牛顿力学来计算运动速度较大的一些物体运动时，计算结果却和实验有所偏离，而对于接近于光速的运动就不适用了。这样，对于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就要作修正，并且要代之以更准确的相对论的力学。

即便是那些由于预言过新现象并得到实验证实的理论，也仍然有可能由新的实践证明它们有一些不灵的“预言”。例如，马克斯威尔电动力学方程的正确性，是由于它对于“位移电流”、“电磁波”等等现象做了一系列的预言，并经实验加以验证后从而证明方程式的正确的。可是当我们把马克斯威尔方程应用于电子绕原子核的运动时，那末按照马克斯威尔方程将“预言”电子会不断辐射能量，在最后就要堕入原子核中。而实践却表明这种“预言”是完全不正确的。

即使那种曾经经过大量的精确实验加以仔细比较、精确测定，并曾经多方面地作出预言，而且得到实验证实的理论，也可能随着实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改。量子力学的定律就是这种例子。量子力学的定律曾经得到光谱学实验的精细的检验，并且能用来广泛地探讨各种物理的、化学的现象。但是用量子力学的理论就不能解释“朗伯能级移动”、“电子反常磁矩”等等更为

精细的实验结果。这时，量子力学就要进一步修改为量子电动力学。

由此可见，科学理论经由实践检验并证明它是正确地反映着客观实际，而在以后又要加以修改的这种事实，完全是历史上合乎规律的现象。

为什么在认识史上要经常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因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总是具体的实践，而理论却是无限的一般的东西，因而由实践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就总有一个“外推”或“内插”的过程，或者说，有一个由有限转化为无限的过程。既然有了“内插”和“外推”，那末新的实践就有可能表明这种“内插”和“外推”未必是不完全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sup>①</sup>。为什么列宁要提出这样的告诫呢？这是因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总是具体的、有限的，而认识上的个别和一般、有限和无限的矛盾，却远不是通过若干次的实践就能得到彻底解决的。

也只有从上述观点出发，才能理解列宁所说的关于真理界限可变动性的一个著名的论点。他指出：“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点滴，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

<sup>①</sup>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小。”<sup>①</sup>为什么随着知識的增加而真理的界限却反而縮小了呢？初看起来，这似乎是难于理解的，但假如我們看到实践檢证中有相对性的一面，那末我們就立刻可以发现所謂真理界限的时而擴張、时而縮小确是科学史上的事实。

如果我們將以上的分析，同杜雷、吳俊光两同志的論点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在他們的理解中恰是抽去了“真理界限的可变易性”这一面。他們认为，实践檢证有一定的作用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来验证科学理論，它完全是可靠的标准，因而它是絕对的，而出了这个范围就不能适用，因而又是相对的。可是，由于他們不是历史地具体地来看待所謂实践檢证的作用范围，于是他們对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絕对性所划的界限，就未免成为空中樓閣了。試問在相对論发现以前，人們能够預先就規定牛頓力学只适用于运动小于光速这一范围嗎？而且即使在相对論发现以后，人們却又发现牛頓力学也不适用于微观世界，因而对于牛頓力学就又要規定一个新的界限，也就是說，它不能应用到由普朗克常数所表征的那些波动性质較显著的微观現象。誠然，从现代科学观点来看，我們會认为把牛頓力学推广应用到高速运动下的物体运动或应用到波动現象較显著的微观世界，完全是一种不正确的“外推”，它并没有实践的根据。可是，从当时的人們看来，人們会认为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牛頓力学可应用到高速运动或微观世界，但是也没有任何证据說它們是不可用的，甚而还可能根本就沒有想到这里还存在一个“外推”的問題。而且，从当时的实验事实来

看，也似乎有一些迹象說明牛頓力学是可用的。例如，在劳倫茨关于电子的模型中，就是用牛頓力学加上电磁場的作用来解释高速运动下的电子的运动的。对于微观現象中的某些实验，如卢瑟福所做的 $\alpha$ 粒子对于原子核散射的实验，就可以用牛頓力学来加以解释，并和实验結果有高度的符合。因此，就当时的人們認識水平來說，他們对于牛頓力学应用的范围虽然不能做出确切的評价，但是，由当时的实验材料以及理論的一般原則看来，它們是具有应用到这些現象的可能的。正因为这样，人們也就不妨先用牛頓力学来对高速运动或微观世界加以处理，而留待实践来做进一步证明。

杜雷和吳俊光同志认为，“正确的实践千百万次并不比一次更能令人信服”<sup>②</sup>。如果这里所指的是通过实践来肯定某一事实，某一現象的話，那末这句话当然是对的，因为把同一个实验重复了千百万次确实不見得比一次实验就会产生什么新的效果。但如果认为理論受到这种“实践”檢驗过，就已經足够证明它是普遍真理，那末在人类历史上所发现的这种“真理”就会多得不可胜数了。

如果我們从自然科学的实践的角度来看待以上所討論的問題，那末就更可以弄清楚双方的分歧所在。从我們在上面所論述的相对真理的界限是历史的有条件的这一論点出发，那末在自然科学的实践上便可以得出一个頗为重要的科学方法上的結論，那就是說，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必須极为慎重地对待

①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4頁。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② 《学术研究》1963年第3期，第44頁。



理論所适用的範圍的問題，如果把理論所适用的範圍估計得過大了，就將使我們導致錯誤；反之，如果把理論所适用的範圍估計得過小了，那又將失去作為理論概括所具有的普遍性質。正因為這樣，所以必須對歷史上一切自然科學理論（包括已經有實踐證明為正確的那些理論）持批判的態度。自然科學研究中的重大進展，常常是對舊有理論進行批判地審查的結果。這種審查可以包括兩方面，有些是擴大它們的使用界限，有些卻是縮小它們的使用界限。例如，現代的量子場論就是將量子電動力學的成就加以進一步擴展和推廣而形成的理論。而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的理論，卻是對於舊有的宇稱守恆的定律作了一番徹底的審查的結果。正因為這樣，我們必須對於實踐檢證過的真理所适用的界限有清醒的估計，並且要善於用實踐來檢驗真理所适用的界限。

可是，杜雷和吳俊光同志卻認為，我所提出的，對於“已有充分科學根據的理論，仍然可以發現這些理論只是相對正確的，仍應持批判的態度，……”等等，是多余的“告誡”<sup>①</sup>，陶德麟同志也反對我所提出的這個意見，認為“這樣來理解實踐標準的相對性，實際上就抹煞了實踐標準的絕對性。”<sup>②</sup>我感到，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批評。難道牛頓力學不是“已有充分科學根據”並經“實踐檢驗證明它為正確”的科學理論嗎？牛頓力學中關於“絕對空間”、“絕對時間”的這種“相對正確”的學說，不正是要修改為愛因斯坦的四度時空的理論嗎？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出現，難道不正是由於愛因斯坦對於牛頓力學進行了透徹的批判的結果？科學史發展的實際情況

就是這樣，為什麼要反對這些意見呢？問題在於牛頓力學雖然有大量的實踐根據，可是這種實踐卻是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精確程度上來做出的，因而在這種實踐基礎上所建立的科學理論，也就不可能十分精確、完善。而當人們的實踐水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時，它也就由適用範圍更為廣泛並且也更為精確的相對論所代替。

不難看出，在我們上述對於實踐標準相對性的分析里，它絲毫也不會像杜雷等同志所批評的，這就要導致對於實踐標準絕對性的否認，因為在這裡既沒有否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客觀標準，也沒有否認實踐標準的可靠性，只不過是指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踐的局限性，以及由這種實踐的局限性所產生的認識上的相對性。可是如果像杜雷、吳俊光和陶德麟等同志那樣，把認識中的不精確、不完善和認識中的錯誤混為一談，那就會看不見這種基於實踐水平的不斷提高而形成的真理的日益精確、完善的过程，使人的認識陷於僵化。人們的實踐是在不斷發展的，與此相應，真理也是在不斷發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踐可以確切地鑒別認識中的正確和錯誤，這是實踐標準的絕對性的表現。可是，承認實踐標準的絕對性並不意味著要排斥承認實踐標準的相對性，這是由實踐標準的歷史的局限性所產生的，也是將由於實踐隨着歷史的不斷發展而逐漸地得到解決的。實踐、認識、再實踐，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也就將不斷精確、深化，這正是真理發展的一個重要規律。

① 參看《學術研究》1962年第4期，第15頁。

② 《新建設》1963年10月號，第99頁。

